

譯 者 的 話

1957年夏，美国北卡罗来納州門羅城的黑人，在罗伯特·威廉的領導下，拿起了枪杆，对美国种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迫害进行了武装自卫，贏得了很大的胜利。《带枪的黑人》主要就是圍繞这次事件闡述了罗伯特·威廉对美国黑人斗争的观点和主張。

这本书原是美国記者馬克·謝勒弗根据罗伯特·威廉在古巴避难时对他发表的一次录音談話編纂而成，并根据威廉发表在《十字軍战士报》和《左翼研究》上的一些文章作了补充。为了使讀者对这一位美国黑人領袖罗伯特·威廉的思想和观点有更好的了解，我們在翻譯这本书时，对原书的編排略为作了一些变动。我們刪去了原編者的《編者說明》和《后記》，并把放在罗伯特·威廉正文前面的馬丁·路德·金牧师和研究約翰·布朗及廢奴运动的学者杜魯門·納尔逊的文章，改为附录放在本书后面。

由于美国統治阶级长期的欺騙宣傳和分化、破坏活动，美国黑人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几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主張。十九世紀末在美国黑人中有过很大影响的布克·华盛顿，就曾鼓吹黑人学习实用技术、培养忍耐性，反对黑人参加政治活动。这种主張的影响所及，只能起瓦解黑人斗志的作用，对黑人的解放事业是非常有害的。今天，提出像布克·华盛顿那样主張的人面然是漸漸少了，但是这种主張的影响，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还有相当多的人仍然幻想用非暴力的手

段來解決問題。但是，这类主張正越来越遭到有見識的黑人領袖和学者的批判和指責。

殘酷的現實教育了广大美国黑人：爭取自由、平等权利和自身解放，是不能依靠向反动統治阶级的良心乞求的，統治阶级的法律是解决不了被压迫阶级的問題的。正如罗伯特·威廉所說的，“要对种族压迫这样根本性的問題进行社会变革，就需要用暴力。在这个問題上，沒有暴力和翻天复地的变革是不能有进展的……”。罗伯特·威廉的主張，一直就是美国广大黑人的主張。

目前，美国黑人爭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今年4月在伯明翰开始的黑人示威运动，不仅在規模、在斗争的方式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持續的时间上也是空前所未有的。当然，正如毛澤东主席所說：“民族斗争，說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問題。”美国黑人弟兄的斗争是和美国全体被压迫阶级爭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面对着日益法西斯化的美国的統治阶级，美国黑人弟兄的解放还要經过非常艰苦的努力。但是，“未来属于今天的被压迫者，我将在美国黑人的解放中亲眼看到这个未来”。我們深信，罗伯特·威廉这一句話体现着千百万美国黑人的理想和願望。美国黑人弟兄，最后一定会同各色人种包括白人在內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一道，成为美国真正的主人。

我們所以翻譯这本书，也正是因为我們衷心地怀着这样一种殷切的願望。

1963年9月



罗伯特·威廉



罗伯特·威廉及其夫人梅芭尔 1962年3月
在古巴哈瓦那。

WANTED BY THE FBI

INTERSTATE FLIGHT - KIDNAPING ROBERT FRANKLIN WILLIAMS

Photograph taken May, 1961.

FBI No. 84-275-B



Aliases: Bob Williams, Robert F. Williams.

DESCRIPTION

Age:	36, born February 26, 1925, Monroe, North Carolina
Height:	6'
Weight:	240 pounds
Build:	heavy
Hair:	black
Eyes:	brown
Scars and Marks:	scar left eyelid, scar left nostril, scar on cell of right leg.
Complexion:	dark brown
Race:	Negro
Nationality:	American
Occupations:	free lance writer, freight handler, janitor, machinist

Fingerprint Classification: 19 L J R 100 8 Ref: T R T
M I T IO A A T

CAUTION

WILLIAMS ALLEGEDLY HAS POSSESSED A LARGE QUANTITY OF FIREARMS, INCLUDING A .45 CALIBER PISTOL WHICH HE CARRIES IN HIS CAR. HE HAS PREVIOUSLY BEEN DIAGNOSED AS SCHIZOPHRENIC AND HAS ADVOCATED AND THREATENED VIOLENCE. WILLIAMS SHOULD BE CONSIDERED ARMED AND EXTREMELY DANGEROUS.

A Federal warrant was issued on August 28, 1961, at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charging Williams with unlawful Interstate flight to avoid prosecution for kidnapping (Title 18, U. S. Code, Section 1073).

IF YOU HAV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IS PERSON, PLEASE NOTIFY ME OR CONTACT YOUR LOCAL FBI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IS LISTED BELOW.

Wanted Flyer No. 290
September 6, 1961

DIRECTOR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SHINGTON 25, D. C.
TELEPHONE, NATIONAL 8-7117

这是美国联邦調查局“通緝”罗伯特·威廉的公告。中为罗伯特·威廉的照片。照片上端标有“緝拿越州潛逃的綁匪罗伯特·富兰克林·威廉”字样。照片下端为罗伯特·威廉的容貌特征等的說明。再下面是注意事项，誣蔑罗伯特·威廉藏有大量軍火、患精神分裂症、鼓吹使用暴力、为人极端危險，等等。



在佩里家中。左起第一人为佩里，第二人为罗伯特·威廉。



在佩里家中的武装自卫队

On an about 4th Sunday
of Aug 1961. I was in
the Union County jail
on 3 charges of breaking
glass and two assault
charges. The Monroe police
and a group of forces of the
Co of Monroe put it
in a position if I
would tell police assault
but in the therefore
way I informed they
would set I went
free of my charges. This
isolation I fled in the
telephone car in the Union
County jail. I went free
for 3 weeks and never
speaking back at and return
of the bridge which
went through it the group
for the assault I did
not see them they turned
over back up on me.
why I will tell you that
Howard Black

这是霍华德·斯塔克亲笔写的供词，供认他在门罗警察局的指示下，殴打年轻的“自由乘客”理查德·格里斯沃耳德。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自卫防止了流血.....	4
第二章 一个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在战斗中重生.....	11
第三章 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战斗性而斗争.....	23
第四章 非暴力助长了种族主义者的气焰：恐怖的一周.....	33
第五章 自卫防止了屠杀：种族主义者制造的绑架骗局.....	41
第六章 門罗事件：迫害黑人的阴谋.....	49
第七章 自卫：美国的传统.....	63
附 录：	
“仇恨总是悲惨的”	馬丁·路德·金 78
非暴力的社会組織	馬丁·路德·金 80
反抗精神	杜魯門·納爾遜 85

序　　言

为什么我要在流亡中对你们说话呢？

因为南方的一个黑人居住区在反对种族暴行的自卫行动中拿起了武器——而且使用了它们。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美国的黑人终于作为一个集体武装起来，在那些法律和秩序已经遭到破坏、当局不能或者不如说不願负责保护美国人不受不法之徒侵袭的地方，来保卫他们的家庭、妻子和儿女。我被认为应对这一行动负有责任。我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并且引以为荣。我主张黑人有权利对三K党的暴行进行武装自卫——并且就是照着这样来行动的。我们西部各州的历史证明，在那些法律不能，也不願维护秩序的地方，公民们就能够，而且必须对不法的暴行实行自卫，这是美国人民应有的权利。我相信这种权利既适用于白人，也同样适用于黑人。

许多人一定会记得，1957年夏天，三K党对南方的一个印第安人居住区发动了武装袭击，遭到了起来自卫的印第安人的坚决开枪回击。全国都赞同印第安人的这一行动，并且普遍对那些掌有优势武装而勇于逃命的三K党徒的失败感到高兴。全国人民因为从来没有告诉他们，所以还不知道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城的黑人居住区所树立的典范，那就是：在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开枪击退了前来侵袭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门罗城分会副主席艾伯特·E·佩里住房的三K党的武装汽车队，其中有两辆是警车。我们分会所持的立场终于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再一次正式肯定了自卫的权利。1959年7月，在纽约举行的第五十

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大會決議的前言說：“……我們不否认，而且再次肯定個人和集體對非法的暴力有自衛的權利。”

因為人們對我的立場作了很多歪曲，我願意在這裡澄清一下，我並不主張為暴力而暴力，也不主張為了對白人進行報復而采用暴力。我也並不反對馬丁·路德·金牧師等人所鼓吹的消極抵抗態度。我和金博士之間的唯一分歧在於我相信自由鬥爭的靈活性。這就是說，我贊成在能夠收效的地方才使用非暴力的策略，只要指出，我還在等候最高法院就“入座示威”案作出判決這一件事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群眾性的非暴力抵抗只有在文明的條件下，在法律保障公民進行和平示威權利的地方才是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在文明的社會里，法律對那種足以破壞民主程序的不法力量是一種威懾的手段。但是在法律遭到破壞的地方，每個公民就有權利起來保護他的人身，他的家族，他的家庭和他的財產。對我來說，這是十分簡單的，名正言順的，不言而喻的。

當被壓迫的人民表示出有保卫自己的決心的時候，作為道義上的弱者和懦夫的敵人就會更願意作出讓步，更願意謀求妥協。況且，從心理上說，種族主義者總是把自己看作是優等的人種，是不會願意以他們優等的生命來換取我們低等的生命的。如果他們的暴力行為能夠不受到制裁，他們就會採取最凶惡、最暴戾的態度。我們曾經在門羅事件中證明了這一點。而且，如果由於我們的自衛而使白人有流血的危險，那末原來對不法的種族暴行採取放任態度的南方地方當局就立刻會維護法律和秩序。這一點我們也在門羅事件中證明了。當黑人準備以武器保衛自己的時候，國家和地方當局的警察是那麼容易和迅速地控制和驅散不法之徒啊。

還要指出，由於國際形勢的關係，聯邦政府不願意讓種族事

件把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南方的局势上去。黑人的自卫行动恰恰吸引了这种注意力，因而即使地方当局不願意，聯邦政府也比较願意維护法律和秩序。当我們的人民成为战斗者的时候，我們的領袖就能够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仰压迫者的鼻息和依靠恩賜，坐在談判桌上。只有这样，双方才会都利于通过談判达成公正的、光荣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在美国的大多数白人对南方黑人每天每日，不，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的暴行，事实上是沒有什么概念的。这种暴行是經過精心策划，有意識地进行的，而且是得到当局容許的。这种暴行已經进行了几个世紀，一直到今天，无日无时曾經停止过，放松过。这就是我們黑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南方的黑人一直过着一种漫长无边的痛苦生涯，它沾滿了恐怖和鮮血——我們的鮮血。在門罗城发生的事件是我亲眼看到的，而且是我亲身忍受过其痛苦的。它将使人們对南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的情况稍有一点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内战开始一百年后，我們在門罗城的黑人在自卫中武装了自己，而且使用了我們的武器。我們的行动說明我們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門罗城和北卡罗来納州的执法当局只有在我們武装起来之后，而且只是由于我們武装起来的結果，他們才終于不得不維护秩序。在此以前，他們在針對我們黑人的种族暴行中，对三K党采取了慘惡的态度。只有自卫才能防止流血和迫使司法机构建立秩序。这就是門罗事件的意义，而且我相信这标志了我們人民生活中的一种历史性轉变。这本书就是叙述那一轉变的始末的。

第一章

自卫防止了流血

1961年6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城分会决定在本市的游泳池四周设置纠察线。这个游泳池是用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钱建造的，但却禁止黑人使用，虽然我们黑人在这个城市的人口中占了四分之一。1957年，我们没有提出要求在游泳池实行种族合一，只要求每星期使用游泳池一天。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在那以后四年中，我们一直被含糊其辞地搪塞着。他们说，日后会另外建造一个游泳池的。在那个期间，有两个黑人小孩子在小河里游泳淹死了。就这样到了1961年，门罗城政府当局宣称，它有了剩余的款项了，但却没有见到什么游泳池，甚至也看不到有什么建造游泳池的意图。所以我们决定在游泳池设置纠察线。我们设置了这道纠察线，把游泳池团团封住了。在游泳池被封了起来之后，种族主义者就决定用南方傳統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他们诉诸暴力，非法的暴力。

我们在那里纠察了两天之后，开始在中午的时候到一个“只限白人”专用的野餐地区吃饭。在野餐区的对面，在一条小河的对岸，一群白人朝我们开了枪，我们能够听见子弹在穿过我们头上的树木时的声音。警长正在游泳池那边值勤，我就呼吁他制止他们向野餐区开枪。警长说，“我没听见，我什么也没有听见。”那一天，白人一刻不停地放着枪。到了第二天，这些白人边放着手枪，边向纠察线挨近过来。我们仍然向警长呼吁，要他禁止他们在我们附近放枪。他还是说，“啊，我什么都没听见。”

游泳池仍旧不开放，我們繼續守着糾察綫。數以百計的人群跑過來，大聲辱罵參加糾察的人。暴行的可能性當時增加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我們只得拍電報給美國司法部要求保護我們進行糾察的權利。司法部要我們去找當地的聯邦調查局。我們去夏洛特見了當地的聯邦調查局，他們說這件事不應該由司法部來處理，這是件地方事件，他們已向我們地方的警長查核過，警長向他們保證一定給我們以充分的保護。這位警長就是當這些人朝我們頭上放槍時，站在那裡袖手旁觀的那一位警長，也就是1957年曾經派兩輛警車參加三K黨的汽車隊去襲擊黑人居住區的那一個警長。

想謀害我

1961年6月23日星期五，我到城裡給司法部又打了一個電話。我在那裡順便捎上一個糾察員，回到城郊的游泳池的糾察線上。當我的汽車沿着美國第七十四號公路向東轉的時候，一輛1955年式的《德索托》牌大型轎車，從後面趕上來，企圖迫使我不駕駛的英國《希耳曼》牌輕型小車越出堤防，從七十五英尺高的一堵懸崖上落下去。我加快速度超到他的前面，制勝了他。於是這個人就從後面向我的汽車衝撞，我們的車擋鎖在一起了，他開始左拐右拐地在公路上行駛，企圖把我那輕型的汽車弄翻。我車上的車擋已經卡住了，我沒有用煞車，因為我怕車子的前輪失效。

我們正好必須路過公路上的一個加油站。這個站是在行車速度不得超過三十五英里的地帶中。當我們經過這個加油站的時候，另一輛車以每小時七十英里的速度追著我們。我開始不斷地按我的喇叭，希望引起公路上的巡邏隊的注意。有三個巡

巡警正好在加油站廣場的堤防对面。他們对那个推着我的車在公路上曲折行駛的人看了一眼，然后两手一撒，哈哈大笑一陣，就掉轉屁股不管了。

他一直推了我四分之一英里之远，推到車輛來往非常頻繁的一条公路的十字路口。这个人希望把我逼得和來往的車輛相撞，但是在大約离公路七十五英尺的地方，我終于擺脫了他的車擋，急轉弯駛进了阴沟里。

我的車子坏了。煞車箱、車輪和軸承都壞了，汽車后身的行李箱給撞得凹了进去。我們把車从阴沟里弄出来之后，我就把車子弄回游泳池那里，并且給警長看。他站起来，看了看車子，呵呵笑着說，“我看不見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沒有看見。”我說，“我离开这里时你正在这里站着哩。”他說，“唷，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要他出一張拘票把我所指认的这个人押起来。这个人就是邦迪亞克一雪弗兰汽車公司在門羅城的經銷商拜納姆·格里芬。他說，“我不能发这样的拘票，因为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坏事。”但是那时站在那里的一个新聞記者开始察看我的汽車的損傷来了。警長一看見新聞記者感到兴趣，就說“好，到警察局来，我給你发拘票吧。”

当我到了警察局的时候，他說，“唷，你只知道这人的名字和車照号码，我不能就那样对一个人提出公訴。你可以把这件事和法院的律师商量一下。我去見了法院的律师，其地位相当于区檢察官，他說，“你只知道一个名字和一張执照上的号码，我不能就根据这些对这个人提出公訴。”我告訴他我认得这个人，而且說出了他的名字。他說，“等一等。”于是他挂了个電話。他說，“我給他打过電話了，他說他沒有干过那样的事。”我又告訴他，我认得这个人，而且我有他所駕駛的汽車的执照号码。最后法院的律师說，“好吧，既然你坚持，我就告訴你怎么办吧。你到他

家里去看一看，如果你认出是他的話，就把他带到这里来，我就发拘票拘捕他。”我告訴他，那應該是警察的事；他們既然拿了人民的俸祿，就應該去把罪犯抓来归案法办。但是他們根本拒絕了給我出一張拘票把这个人拘捕起来。

* * *

“媽的，黑鬼有枪！”

糾察綫繼續守着。我們在那个星期天到游泳池去，途中必須經過同一个路口（第七十四号和第六〇一号公路交叉的地方）。那里大概有两三千人沿公路排列着。有两三个警察站在路口指揮着来往的車辆，还有两个警察一直从我們家里起就跟着我們。有一辆沒有窗子的旧貨車停在路口的飯店旁边。当我们駛近的时候，这辆车子用最大速度突然往后一退。这辆车子的司机希望拦腰撞击我們，把我們撞倒。但是我把方向盘猛轉，于是这辆破車撞着了我的汽車的前部，两个車都掉进了沟里。

人群尖叫了起来。他們說一个黑鬼冲撞了一个白人。他們正指的是我。他們叫着嚷着。“杀死这些黑鬼！杀死这些黑鬼！用汽油澆在黑鬼身上！燒死这些黑鬼！”

我們不动声色地坐在車里。那辆旧車的駕駛員从車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棒球棍，对着我們走来，說，“黑鬼，你为什么要撞我？”我什么也沒对他說。我們仍然坐在那里望着他。他走近我們的車，棒球棍离我們只有一臂之差，但我仍然一言不发，我們的車子也不移动一步。他們不知道我們是有武器的。根据北卡罗來納州的立法，汽車里帶武器是合法的，只要你不把武器隱藏起来。

我在汽車里帶了两枝手枪和一枝来福枪。当这个家伙开始

把棒球棍举起来的时候，我把一枝軍用四十五毫米口徑的手枪在汽車窗口一放，把槍口正对着他的臉，一言不发。他看看手槍，什么也沒有說，从我的車那里縮了回去。

人群中有人放了一枪，人們又神經质地嘶叫起来，“杀死黑鬼！杀死黑鬼！用汽油澆在黑鬼身上！”暴徒开始朝我們的車頂扔石子。我就打开了車門，一脚跨下地去，托着一挺意大利式的卡宾枪站立在車門邊。

在这整个時間內，三个警察一直都是站在离开我們五十英尺的地方，我們一直在車里等着他們來搭救我們。當他們看見我們帶有武器，暴徒不能抓住我們时，两个警察就奔跑过来。一个跑到我的跟前，一把揪住我的肩膀說，“放下你的武器，放下你的武器！”我朝着他的臉一拳把他从我的車那里打了回去，把我的卡宾枪对准着他的臉，告訴他說，我們不会对暴徒投降。我告訴他我們并不会听凭私刑吊打。另一个在我汽車侧面跑过来的警察正要从枪套里掏出他的左輪手枪，希望从背后給我一枪。他們沒想到我們不是只有一枝枪。学生中有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把四十五毫米口徑的手枪对准警察的臉，告訴他說，如果他敢掏出枪来，就打死他。这个警察就把枪放回枪套里，从我的汽車那里倒退回去，掉进了沟里。

人群里走出一个年紀很大的白人。他像一个嬰孩似地大哭大叫。他边哭边說，“媽的，媽的，他媽的，这还成个什么国家，黑鬼居然有枪，居然武装了起来，警察甚至逮不住他們！”他痛哭流涕，最后有人把他从人群里扶走了。

只有依靠自卫，才能得到保护

門罗市議会的議員斯蒂夫·普雷森来了。他告訴警長开放

公路，把我們弄走。警長告訴議員說，“他們有槍呢！”普雷森說，“別管那。把公路開放讓他們走吧！”他們開放了公路，那位市議會議員帶領我們走了出來。在大路兩側，排列着的人群大概有三分之一英里那麼長。他們嘶叫着，“殺死這些黑鬼！殺死這些黑鬼！不許在這裡實行種族合一。不同黑鬼子一起游泳！”

在我們快到游泳池的時候，別的一些陸續前去的學生早已組織了糾察線。在游泳池四周大約有三四千個白人。全城的官員，包括門羅城的市長都在那裡。他們戴着墨鏡在人群里站着。人群不斷地嘶叫着。警長跑到我的跟前說，“繳出你的槍！”我告訴他我什麼槍也不繳。我們的那些槍是合法的，而他們是一群暴徒，如果他要那些槍的話，他可以在我們離開這裡之後到我家來拿。他說，“好，如果你傷害了這裡的任何一個白人，你媽的，我就槍毙你！”我不知道什麼東西使他認為我会讓他活得那樣長來槍毙我。他在四周白人嘶叫声中不斷地說，“放下槍來！”

那個市議員又出現了，他說緊張不好，會傷人的。他承認我有權利參加糾察。他又說，如果我願意回家，他就会考慮派人護送。我問他誰來護送我們回家。他說，“警察。”我告訴他，如果可以和他們一起回去，那我也可以和三K黨一起回去了。我說只有在一個條件下我才和警察局的人一起走。他問那條件是什麼。我說，我讓我車里的學生下來一個，由他們換一個警察上來，我才放心，才會感到他們是會保護我們的。警察說，他們不能那樣辦。他們所以不能那樣辦，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同暴徒一起行動，那末這個警察是會受到傷害的。

那些官兒喋喋不休地說人群是怎樣地不能控制啦；也許會傷什麼人啦。我告訴他們，我決不離開那地方，除非他們從公路那邊撤退干淨。我也告訴他們，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將在那裡堅

持下去。最后他們問我，建議他們怎么办，我建議他們同州政府的警察当局联系。因此他們同州警察当局进行了联系。州警察当局派来了一个年老的班长和一个年輕人，一共两名州巡邏警。那里的人有三四千之多，而全城出动的警察有二十一人，他們說无法維持秩序。

老头儿一面咒罵着，一面要人們后退，散开或离开那里。他揮舞着棍子。暴徒中有些罵起娘来，他就說，“媽的，我要真干的。走开。”他們看出了苗头，頃刻之間人群作鳥兽散了，官儿們和州警察当局知道，如果他們准許暴徒襲击我們的話，許多人会遭到杀害，而且其中会有一些白人。

兩辆警車护卫着我們离开了那里；一辆在前，一辆在后。这样办还是第一次。有些白人嚷着，“瞧，他們居然保护黑鬼呢！瞧，他們原来是这样把黑鬼从这里带走的！”

由于我們所采取的立場和我們战斗的决心，北卡罗来納州政府維护了法律和秩序。只出动了两名州警察就解决了問題，而且沒有伤一个人。通常(在南方)那得流很多黑人的鮮血。那一年当局封閉了游泳池，因而我們撤退了糾察線。

这并不是我們 1961 年在門羅城的斗争故事的結束。由于命运的作弄，发生了另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关系到“自由乘客”和他們的消极抵抗的政策。他們的政策执行的結果和我們的自卫政策执行的結果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这对所有的黑人都是一個生动的客观教訓。但是在我談那个問題之前，我必須先叙述一下我們的自卫政策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門羅城的黑人社会又是怎样終于支持我那个必須“以暴力來对付暴力”的結論的。

这个故事开始在 1955 年，那年我作为美国海軍陆战队的退伍軍人回到了我的故乡門羅，并且参加了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当地的分会。

第二章

一个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 在战斗中重生

我的家乡是北卡罗来納州的門羅城。这个城有一万一千居民，約四分之一是黑人。它是尤宁县县政府的所在地，离南卡罗来納州边境十四英里。这个地方的精神面貌，与其說接近于人們往往和北卡罗来納州联系在一起的圣堂山^①的自由气氛，还不如說更接近于南卡罗来納州的气氛。在我們这个城，沒有职工会，而三K党在东南区的总部却設在那里。

在我退伍回乡的那个时候，那里还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已經气息奄奄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尤宁县的有色人种协进会是个典型的南方分会，規模小，不活跃，基本上由黑人社会中的上层分子——自由职业者、商人和职员——組成，并且受他們控制。

在 1954 年最高法院关于消除种族隔离的判决以前，有色人种协进会并不是种族隔离分子的首要目标。在南方的許多地方，包括門羅城在內，种族主义者是不太关心小規模的地方分会的。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急剧地改变了种族主义者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三K党和白人公民委員会开始认真調查附近的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址，調查負責人是誰，哪些人是會員。他們用武力和經濟制裁来威胁人們，逼迫他們退会。这些分会本来就

① 圣堂山是北卡罗来納州的一个鎮的名称。——譯者

是規模很小的，这时迅速地衰落下去了。

一个老兵回到了家

当我从海軍陸战队退伍的时候，我一心要回到家乡去参加有色人种协进会。我在海軍里曾經嚐到歧視的味道，几次被关进了班房。我参加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的时候，正逢这个分会的會員减少到只有六个人的时候。这个分会的领导建議把分会解散。我反对解散，他們就把我选为主席，然后都退出了分会，只剩下艾伯特·E·佩里博士和我两个人。佩里博士是一个剛在門罗城定居下来的新人，在那里行医很得众望，因此他就当选为我們的副主席。我設法劝說以前的會員回来，但都无效，最后我认识到我只能在沒有本地黑人头面人物参加下进行工作。

那个时候，我是沒有經驗的。我在参加海軍陸战队之前，曾經有一个时期离开过門罗城，在新澤西的一家飞机厂和底特律的一家汽車厂里做工。那时我曾不知不觉地从周圍的活动中得到了一些关于組織起来的想法，只是我从来沒有在地方工会中工作过，因而缺少做組織工作的經驗。但是我已经是一个爱活动的人，不願意在像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重要的事情上抱消极态度。

就这样，有一天我走进了城里的一家黑人彈子房，打断了他們的游戏，把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些宣傳品往彈子桌上一放，而且讲了一通。我把那里一半的人都吸收入会。这样我就使我們的分会迈开了新的一步。我們在工人、农民、家庭佣工、失业黑人以及当地的全体黑人中展开了征集會員的运动。結果这个分会变成了一个由工人阶级組成的組織，领导分会的也不是中产阶级，因而我們把分会变成了整个有色人种协进会中的一个

独特的分会。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分会有英勇坚强、不畏强暴的很多退伍軍人参加。我們在門羅和尤宁县展开了要求在公用事業中实行种族合一的斗争，而且得到了一群信奉单一上帝教的白人的支持。在 1957 年，我們毫无阻碍地在公立图书馆中消除了种族隔离。但是使我們大为吃惊的是，在南方的其他州城，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州，黑人为了想在图书馆里实行种族合一而遭到横暴的迫害。

我們进一步为黑人爭取更大的权利：經濟的权利，教育的权利和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保护的权利。我們迅速地获得了我們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中最具有战斗性的一个分会的声誉。很显然，如果我們不敢去触怒那些企图阻止美国黑人像美国白人一样享受他們不可剥夺的人权的种族主义者，我們是不能得到这种声誉的。具体說，我們激起了三K党的愤怒，我們和他們在游泳池实行种族合一的問題上展开了一場决战。

三K党采取行动

我已經說过，游泳池是通过公共工程管理局的安排用聯邦政府的款項建筑起来的。不管是聯邦政府也好，或是地方当局也好，都沒有为黑人提供过什么游泳的設备。在几年的时间內，有好几个我們黑人的孩子在沒有人管理的水沟里游泳而淹死了。当 1956 年我們又死了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們就展开了一个为黑人，特別是为我們黑人孩子們要求游泳設備的运动。

首先，我們請求門羅市当局在黑人居住区中建造一个游泳池。这将会是个种族隔离的池子，但我們还是請求建造这样一个池子，因为我們所关心的只是想为我們黑人的孩子提供一些安全的設备。門羅当局說，他們不能同意我們的这种請求，因为

這太花費了，他們沒有這一筆錢。既然這樣，我們為了謀求妥協，就要求他們把那個禁止黑人使用的游泳池每星期空出一兩天來供我們的黑人孩子游泳。當我們提出這樣的要求時，他們說這也太花費。我們問他們為什麼會太花費呢？他們說，因為每次有色人種用過之後，他們就得把水抽干，重新換水。

他們說，等到他們有了款子，他們會給我們建造一個游泳池的。我們問他們什麼時候可以盼到。一年嗎？他們說，不。我們問，五年嗎？他們說，不，他們不能肯定。我們問，十年嗎？他們說不能肯定。我們最後問，我們是否能在十五年內盼到呢？他們說，他們不能給我們任何肯定的許諾。

在黑人居住區里有一個白人天主教傳教士，他有一輛旅行汽車，他願意用車把黑人青年送到離城二十五英里的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城去，讓這些青年在那里的黑人游泳池里游泳。有些夏洛特城的官員看見這個傳教士在一個黑人游泳池里游泳，他們就打聽他是誰。游泳池的黑人管理員解釋說，他是一個傳教士。這些官員說，他們不管他是不是傳教士，他們只知道他是白人，夏洛特城是實行種族隔離的，因此他們禁止這個傳教士進入這個有色人用的池子。

於是孩子們仍然沒有任何安全的地方去游泳——因此我們決定對門羅游泳池採取法律行動。

第一，我們開展了一個在那裡當場立等的運動。我們到那裡站一会儿，要求進入，但一直沒有得到許可。當我們這樣為今後可能採取的法律手段進行準備工作時，三K黨挺身而出了。報上開始登載關於三K黨的活動的文章。起初，他們提到將有几百個人在空地里集合，舉行三K黨的大會。以後人數越來越多，一直增加到了三千，四千，五千之多。到最後，據《門羅諮詢報》的統計，有七千五百個三K黨徒聚集在一個場地上，討論如

何对付被他們称为“受共产党鼓动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張种族合一的分子。他們开展了一个驅逐我們的运动，要把我們从黑人居住区里撵走，其锋芒首先針對着我們分会的副主席佩里博士和我。

三K党的这个运动是以散发請願书开始的。为了征集签名，他們在門罗城法院的廣場上摆了一張桌子。請願書說，佩里博士和我應該被永远驅逐出尤宁县，因为我們是“共产党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負責人和成員。三K党揚言他們在第一个星期征集到了三千人的签名。在第二个星期，他們揚言又得到了三千人的签名。他們沒有任何可以采取法律行动的根据，但是他們却希望單純用數目字就把我們吓得离开这个城市。在南方的历史中，在过去的日子里，一个黑人只要知道有这么多人要驅逐他，他就会自己出走的。人們一定記得，在这个居住区里据報紙統計三K党有七千五百个支持者，而全城的人口只不过約一万二千人。事实是，許多三K党徒是从南卡罗来納州来的，門罗城离南卡罗来納州边境不过十四英里。

当他們发现这不能吓倒我們的时候，他們就决定采取直接的行动。在他們的大會以后，他們的汽車队就长驅直入进入到我們的居住区里，他們一面按汽車喇叭，一面朝車窗外开枪。他們曾經在一个偏僻的路角抓住了一个黑人妇女，用手枪对准着她，逼她跳舞。

在我們黑人居住区发生这一暴行的时候，一群和平主义的牧师去見了市政当局，要求他們禁止三K党徒組織这些汽車队，列队經過門罗。县和市当局的負責人以三K党是一个合法組織，它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样有宪法賦与的組織权利为理由，拒絕了这些牧师們的請求。

自卫是从我們的苦难中誕生的

既然市政當局不願阻止三 K 党，我們就決定由我們自己來阻止三 K 党。我們的這種行動是出于防衛的需要，因為法律和秩序已遭到破壞；因為門羅城根本沒有什麼像美國憲法中第十四修正案那樣的東西。地方當局拒絕維護法律和秩序，當我們轉而請求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當局出來維護法律和秩序時，他們不是拒絕了我們的請求，就是對我們的請求置之不理。

現任商業部長路德·霍季斯那时是北卡羅來納州的州長。我們最先向他提出了呼呼。他袒護三 K 党的立場，說三 K 党沒有破壞法律，也沒有不守秩序。於是我們又向艾森豪威爾呼呼，但是我們的呼呼從未得到答复。華盛頓方面毫無反應。

所以我們就開始武裝自己。我寫信給鼓勵退伍軍人保持保衛國土的本領的“全國來福槍聯合會”，要求批准我們成立分會，我們得到了許可。在一年之內，我們的會員發展到了六十人。我們也買了一些槍枝作為儲備。後來北方的一個教會捐了錢，為我們買了些更好的槍枝。三 K 党看見我們在武裝起來保衛我們的居住區。他們在 1957 年的夏天費了很大力氣來阻止我們。他們的一個武裝汽車隊對黑人居住區近郊的佩里博士的住處發動了攻擊。我們和三 K 党開槍互射，打退了他們的攻擊。這使三 K 党再沒有胃口打這樣的仗了。他們停止了對我們居住區的襲擊。在這次戰鬥之後，那些說三 K 党有組織權利的同一個市政當局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通過了一項法令，禁止三 K 党不經過警長的特別許可就進入門羅。

在我們和三 K 党發生衝突的時候，只有三家黑人的出版物——《美籍非洲人雜誌》，《諾福克指針報》和《黑寶石雜誌》——

报道了这件事。《黑宝石杂志》还登了几张自卫队的照片。我們的战斗发生在那一次有名的印第安人和三K党开火事件之前两星期。我們把三K党从我們的城市驅逐到印第安人的居住区。全國的報紙所以乐于那样大事报道印第安人和三K党人的开火事件，是因为他們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印第安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因而誰都可以把这件事当作逗乐的玩笑，一笑置之——但是可沒有人願意使黑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彷彿这就是他們用以对付三K党的公认的方式。所以白人的報紙对于門罗的战斗采取了严密封鎖的手法。

在三K党知道使用暴力不能达到目的后，就利用种族主义的法院。他們控告佩里博士犯了莫須有的墮胎罪。他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医生。有一位曾經担任过县政府卫生局局长的医生从四十英里之外驅車前来替佩里博士作证。他宣布說，当佩里博士在医院里工作的时候，曾經拒絕給县政府福利局开具絕育許可证，因为这是違背他的宗教信仰的。但是佩里却被判有罪，判处了五年徒刑，而且被吊銷了行医的执照。

吻臉事件

1958年10月，两个本地的孩子——七岁的大卫·辛普森和九岁的海諾佛·湯普逊以强奸罪被捕，这种罪名在北卡罗来納州可以判处死刑。

这就是有名的“吻臉事件”。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大卫和海諾佛同几个白人儿童在一起玩一种叫做“牧童和印第安人”的游戏。白人女孩中有一个叫西西·薩頓的坐在海諾佛的膝上，忽然认出了海諾佛是她的老游伴。原来海諾佛的母亲是替西西的母亲做过活的。海諾佛在学齡以前，他的母亲到

薩頓家去做活總是把他帶在身邊的。

這個姑娘發現海諾佛是她的老游伴，就在他臉上吻了一下。到了下午，她跑回家去告訴她的母親說，她怎樣見到了海諾佛，又怎樣因為能够重新見到他感到很高興而吻了他。

薩頓夫人聽了就緊張得心神不安，她去見了警察當局。兩個孩子沒回到家就被捕，並且被關進了監獄。在北卡羅來納州，如果有人因為強奸而遭逮捕，那末在警察當局偵查時期是不准與任何人見面的。據此理由，警察當局沒有通知小孩的家長。

幾天之後，我們終於發現了事情的原委和兩個失蹤孩子的下落，我們就去設法求援。但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却不願與聞此事，因為這是件“桃色案件”。一個七歲的白人女孩吻了一個九歲的黑人男孩的臉，協進會的全國委員會就不願過問了。

孩子在被逮捕後不久，就被送進了感化院。我請了專辦公民權利案件的律師康拉德·利恩，于是他從紐約來到了我們這地方。首先，他和判刑的漢普頓·普賴斯法官進行商談。

這位法官對利恩律師說，他曾經舉行了一次“單獨而平等的審訊”。利恩問他所謂“單獨而平等的審訊”是指的什麼。法官就告訴他說，那天早上開庭，他把薩頓夫人和她的女兒傳了來，薩頓夫人作了一番陳述之後，她們就被送了回去，到了下午，兩個黑孩子的母親被傳到法官面前，她們的孩子也同時帶來了。然後法官對利恩律師說，“我把薩頓夫人告訴我的話轉告了她們，既然孩子們犯了罪，我就把他們送到感化院里去十四年。”

有色人種協進會全國委員會仍然不願過問這個事件。但是利恩律師的一個朋友，一個英國記者，訪問了感化院，而且暗地裏弄出了一張兩個孩子合拍的照片，和一則新聞一起在1958年12月15日的倫敦《新聞紀事報》的頭版上發表了。就這樣，整個歐洲都風聞了這件事。在倫敦、鹿特丹、羅馬和巴黎到處掀起了

示威行动。只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的报纸才开始对“吻脸事件”表示了“关心”。

1958年12月底，佩里博士、康拉德·利恩和我被罗伊·威金斯召到纽约去。他说，如果我愿意离开门罗，他就可以给我在底特律找一个工作。我断然拒绝了他的交易。

到了这个时候，在国外，甚至在美国，压力越来越大，终于使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委员会不得不干预这个案件——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和可怕的两性关系这样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案件。在一月下旬，法庭开了一次审，但是孩子们被送回了感化院。世界的压力增长着。例如荷兰鹿特丹地方一所以罗斯福总统命名的中学的一万五千名学生和教职员签署了一项请愿书，要求释放两个孩子。这封请愿书被送到罗斯福夫人那里。

最后，有人对艾森豪威尔说了些话，他终于又对我们当时的州长霍季斯交代了几句，于是孩子在1959年2月13日被释放了。

“我們要用暴力对付暴力”

1959年，在门罗城旅館里当女僕的乔治亚·怀特夫人，一位有五个孩子的黑人母亲，被一个白人旅客踢倒，从楼梯上直栽下来，跌到了旅館的前厅里。他说他把怀特夫人踢下楼梯，是因为她在走廊里工作的时候声音太大了，扰乱了他的睡眠。当我们要求对他提出公訴时，警长曼尼拒絕了我们的請求。我们威胁說要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請来采取法律行动，他才变得溫和了一点，让这个白人繳七十五美元保釋金。但是，这个白人被告結果并没有出庭受审，他沒有被提起公訴。

就是在那一天，另外一个黑人妇女名叫瑪丽·魯思·李德

夫人的，也在法庭里。李德夫人已經怀孕八个月。有一个白人闖进了她的屋子想强奸她沒有成功，就把她从屋子里赶到外边打了一頓。她想往大路上逃走，那个白人就一把揪住她，把她打倒在地上。李德夫人有一个六岁的孩子，跟在她的身边一起奔跑，在这个白人强奸犯毆打他母亲的时候，这孩子捡起一根木条往白人头上打去，他的母亲乘机逃脱了。她跑到了一个邻居的家里，邻居把警察叫来帮她忙。这位邻居是个白人，她在那天和李德夫人一同到法庭去。她作证說，她看見被告追着李德夫人，而且看見李德夫人到她家的时候神色十分慌張，沒有穿鞋，被撕破了衣服。这样的证詞，对李德夫人的白人邻居來說，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

在审訊期間，被告的辯护人安排被告的妻子坐在被告旁边，仿佛她也同这个案子有关似的。然后被告的辯护人向庭上作了申诉。他說，“尊敬的法官先生，陪审的女士和先生們，請你們看看这个男人吧。这是他的妻子。这个女人，这个白种女人是純洁的生命之花。她是上帝創造的珍宝，是一朵純洁的花。你們想一想，这个男人会抛棄这朵純洁之花去找那种女人嗎？”他把事情說得仿佛这个黑种女人倒是在真正受审似的。然后他結束了他的辯护說，“这个問題只是在于你相信这个女人呢，还是你相信这个白种男人。尊敬的法官，这个男人沒有犯什么罪，他只是喝了酒，寻点小小的开心而已。”这个男人就被这样开釋了。

李德夫人有几个兄弟，他們曾經想在审訊开始前杀死这个侮辱她的白人。但是我亲自說服了他們什么也不要干。我說這是一件需要以法律来处理的事情。我还說我們一定找一个律师。我們的确找了。我們从远自紐約的地方把律师請了来，但是他在法庭上甚至不准說一句話。所以这个强奸未遂犯沒有受到惩罚，我是有責任的。

法庭里滿屋子都是黑人妇女。当这个男人被开釋时，她們就轉身对我说，“現在你說怎么办？你对我们打开了禍水之門，这些人現在知道他們要把我們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了，法律制裁是沒有指望的，这就是說我們已暴露在这些白人的面前听任他們宰割了，这應該由你負責。現在你还有什么說的呢？”我告訴她們說，在文明的社会里，法律是遏制强者欺侮弱者的一种威慑力量；但是美国的南方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南方是个野兽社会，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們必須訴諸野兽的法律，我們有必要創立我們自己的威慑力量。我还說，我們今后要用我們的武器来保卫我們的妇女和子女，我們的家庭和我們自身。我們要用暴力來对付暴力。

我的声明在美国全国到处轉載。我所說的是，“今天的事實表明，美国南方的黑人不能指望在法庭上得到正义，他們必須把犯罪者当场惩办。他們必須用暴力对付暴力，用私刑对付私刑。”

第二天，我在接見《卡罗来納时报》記者时再一次指出得不到法庭保护的事實，我說，“这些法庭的判决为暴力开辟了道路。我并不以为黑人應該跑到街头去为他們所受到的虐待和不平进行报复……。”我在同一天又在辛辛那提广播电台作了这种声明，那天晚上，在夏洛特市的一次电视訪問中，我又一次明白地表示，在法庭不能保护我們时我們就起来自卫。

既然原則是这样地明白无疑，我不能理解我的声明为什么引起了震动，为什么在全国受到那样广泛的傳播。两年以前，当我们开枪反击三K党来进行自卫的时候，美国沒有一家白人的報紙对这事件作了报道。我們只是要大家注意我們还要做更多同样的事情，黑人的自卫将在門羅城坚持下去。所以对我來說，我並不感到我們做了什么新的事情。我現在才认识到，我們那时

是在樹立一條原則，這條原則是從我們的經歷中得出來的，它能够而且會給別人樹立一個榜樣。

回頭來看，種族主義者宣傳我們的立場顯然是個大錯誤。縱然這使我和我的家族受到了很大的痛苦，但其結果却迫使他們不能不在這個問題上展開一場辯論，而且這還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胆怯態度，迫使協進會終於再一次正式肯定黑人對種族主義者的暴行有實行自衛的權利。

第三章

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 战斗性而斗争

在我的声明震动了全国性的报纸以前，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全国委员会对我们并不怎么重视。在我们的斗争中和我们需要的时刻，我们很少得到过他们的什么帮助。现在他们却刻不容缓起来。就在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全国委员会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希望知道我的声明是不是被准确地引用了。我告诉他们是被准确地引用了。他们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不是一个暴力组织。我解释说，我知道它不是一个暴力组织。于是，他们说，我发表了暴力性的声明。我回答说，我是以罗伯特·威廉的名义发表声明的，不是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名义发表的。他们说，正由于我是这个组织的一个负责人，我说的任何话都会被认为就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政策，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我问他们，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的这样密切，那么当我由于三K党的经济压力而成为一个失业的牺牲者的时候，当我被保险公司认为风险太大而被取消了所有的保险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来营救我。我问他们，为什么那时候他们就不考虑考虑我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停职，歪曲和重选

几小时以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金斯就停止

了我的职务。这件事我并不是从全国委员会知道的。我是从南方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才第一次听说我被停职了。广播每隔半小时就重复一次，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已经由于我鼓吹暴力而停止了我的职务，因为暴力不是解决种族问题的一种手段，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反对黑人把暴力当作自卫手段的。

我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尤宁县分会是南方少数的种族混合的分会之一。我們的会员中有一些白人和平主义者。当我被停职以后，他們打电报給全国委员会，說明他們是白色的南方人，是和平主义者，但是他們抗議我被停职，理由是，他們了解这个居民区中的問題，而全国委员会并不了解。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电报。也从来没有一份報紙报道过我們的分会是一个种族混合的分会，甚至南方的白人和平主义者也支持我的立場。

尽管如此，这个問題还是发展成了全国性的辯論。我們发现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章中沒有一条是可以为罗·威金斯的虚伪行为辩护或是授权他这样作的。我要求举行一次意見听取会。威金斯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直属的分会委员会，他們在 1959 年 6 月 3 日在紐約举行了一次变成为对我进行审訊的听证会，在这次会上我就停职問題进行了斗争。这个委员会判决我停职六个月，六个月以后，我可自动恢复原职。

关于停职問題，我不想再糾纏下去了；因为我面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由于审訊的結果，我更加深信我們最重大和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是进一步改善我們本种族的內部联系。真正的美国黑人的斗争只是一个相互脱节的反抗网而已，更令人感到羞慚的是，黑人依赖白人提供的不准确的报道作为他們获得这些孤立的斗争的消息源泉。我回到家乡，集中精力办了一个通訊，这个通訊将把在美国发生的美国黑人的解放斗争和我們在門羅

城經常进行的詳細斗争情况，准确地和毫不含糊地告訴黑人和白人。第一期《十字軍战士报》于 1959 年 6 月 26 日用油印机印出来了。

接着，我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第五十届全国大会快要举行的最后时刻，我决定請求把委員會的決議提交 7 月在紐約召开的这届全国大会。全国委員會认为有必要由大会散发一个专门的小册子來攻击我。他們的小册子說，我們主張黑人以暴力对付暴力作为自卫手段就是鼓吹使用私刑手段，企图把两者混为一談。这样全国委員會就助长了种族主义報紙所渲染的錯誤印象：我鼓动种族战争和不分青紅皂白屠杀白人。

大会的代表們表示支持給予我的停职处分，因为有很多代表或是意識到或是被迫地把这次投票看作是公开支持还是公开反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全国領導問題，但是在当前实质性的問題上，代表的情緒迫使全国領導支持了自卫的观念。大会通过的決議前言說：“……我們不否认，而且再次肯定个人和集体对非法的暴力有自卫的权利。”

我被停职期間，我們分会的會員們选举我的妻子代替我当主席。六个月以后，我并没有自动地恢复原职，我举行了一次选举，因为我不願意让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委員會认为他們对我还有什么照顾。我們进行了选举，我被一致通过，重新当选。

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委員會一心要向一些有影响的北方白人討好。这些人都是对我们的战斗精神感到头痛的。他們对我们的分会保持冷淡态度。我們只有一份他們发給的批准成立分会的证书，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在我们的黑白人合校事件和入座示威事件中，我們沒有能从他們那里得到任何帮助。

1960 年，我們发动了一次入座运动。我們成为北卡罗来納州发动入座示威的第十三个城市。虽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

沒有重視這次鬥爭，但是我們的入座示威說明了自衛和非暴力能够很好地結合起來。門羅的入座示威比起南方的其他人座示威來，暴力事件更少。在別的地方，有的黑人被打破了頭，但是在我們的入座示威中，甚至連一個示威者被人啐口水的事都沒有發生過。我們的示威所以沒有出現什麼暴力，是因為我們已經顯示出我們有保卫自己的決心和準備。我們在門羅的大街上，不是以仰賴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怜憫和施舍過活的乞丐身份出現的，我們是以有力量的人民的身份出現的；維持和平的關係對有關各方相互間都有好处。

當示威正在進行的時候，我被捕了，最後我被判服苦役三十天。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應該來處理我的案件。他們把我的案件上呈到州最高法院，但是接着在萬截止提出申訴只有幾天的時候他們不告訴我就對我的案件撤銷了上訴。我是從報紙上發現這件事情的，因為我的案件是和北卡羅來納州聖堂山的七名學生案件連在一起的。報紙上列舉了曾由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律師提出上訴的被告人名單，在這個名單上，唯獨沒有我的名字。我向緊急公民權利委員會提出了申請，他們受理了我的案件，並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訴。

* * *

“一封‘大亨’的來信”

所有這一切，並不是說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沒有接到過什麼勸告。他們一面認為他們沒有責任向更高一級的法院就我的案件提出上訴，但同時，當1960年夏天我從古巴回來的時候，他們却認為有責任寄給我一封信。我接着又到古巴訪問過兩次。

我在門羅的經驗和我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打交道的經驗

使我終於創办了《十字軍战士报》，这些經驗同时也使我更加了解了世界各地的黑人斗争，他們的遭遇，他們的胜利和失败。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古巴的黑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构成了古巴革命的一部分，我的訪問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有一个黑人就成了古巴军队的领导人。这是在美国任何人也无法对我们掩盖的事实。对我來說，这次革命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而不是一次虛偽的南美宫廷革命。有一股真正的推动力量把社会正义帶給所有的古巴人，其中也包括黑人。从 1959 年年末起，我就开始在《十字軍战士报》上发表报道古巴实况的文章，指出那里存在着种族平等。这些文章似乎惊动了全国委員会，他們写給我一封信，其中有这类的話：

“……但是我怀疑你是不是充分地認識到了你似乎乐于采取的那种行动的危險性和害处。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密切地注意着古巴所发生的事情，特別是今年秋天卡斯特罗博士对联合国的訪問。不管古巴的事业有什么价值，我对那种經常的不誠实的表現感到十分不安。我相信，在你发现你自己在古巴和我国目前的不幸爭執中被用作別人的走卒以前，这种不誠实的表現是值得你深思的。

“……这是对于美國國內問題的一种蛮橫的干涉，担任美國黑人运动中领导职位的任何一个負責人都應該有这样的認識。

“……目前古巴要討好美国黑人是明显地出之于一种不良的动机。（我要問你，美国黑人旅行者在古巴听到不断地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时作何感想。）

“……你难道願意放棄在我国也同样反对压制黑人权利的那部分人的重要支持嗎？

“……难道偉大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逊的不幸事例还没有使你认识到，你似乎正要選擇的道路是危险的和錯誤

的嗎？保羅·羅伯遜尽管有他的偉大之处，但是在目前为爭取平等的斗争中，他到底为美国黑人作了些什么呢？很遺憾，答案只能是这样：一事无成。”

摘引的这些話都在《十字軍战士报》上发表了，我对这些話的答复是这样的：

“只有白痴和唯利是图的伪君子才能厚着臉皮說，这样一个国家和它的偉大領袖在对待北美被奴役的黑人中是不誠实的，因为他們在日常活动中充分地表現了目前世界上最大限度的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必須从國內开始，然后再推广到国外，这是最簡單明白的道理。在过去几个月，我曾两次訪問古巴，在那里，使我感觉到我是一生中第一次成为人类的一員，这沒有什么不誠实可言。如果这是美国观念中的不誠实，那么但願上帝也能使美国变成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自由古巴那样不誠实地賦予非洲血統的人民以进入人类行列的权利吧。

“至于說我在古巴反对北美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斗争中‘充当了走卒’，那末我宁願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不願站在歧視和迫害黑人的一边。我宁願充当一个傳播尊重人权的人民的真理的工具，而不願充当一个为迫害和歧視黑人塗脂抹粉的湯姆叔叔^① 和一个为美国伪善行为辯护的人。古巴憎恨美国对人的不人道行为，并不是对‘美國國內問題’的干涉。‘自由世界’的統治民族极力对外輸出北美制造的种族主义，这是人人皆知的。美国的种族主义是同納粹主义一样的世界問題。如果美国可以成为唯一的一个違反了联合国人权宪章而不受制裁的国家，那么，联合国这个堂而皇之的組織也就成了压迫美国被奴役人民这一严重罪行的参加者了。拿我來說，我就不能对企图毀

① 湯姆叔叔是斯陀夫人所著《黑奴吁天录》一书中的主人翁，一个逆来順受的老黑奴。——譯者

掉我的那股勢力保持沉默和采取合作的态度。

“美國的种族主义者是地球上最殘暴的人，如果被压迫的美國黑人认为我們應該把这个生死攸关的斗争看成是自己家里的事，那就太愚蠢了。我們是受压迫的，当然我們要把我們的疾苦向國內国外申诉。美國的种族斗争不仅不是一个只有美国人参加的斗争，更不是一个只是黑人为了黑人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目前世界上任何一种爭取自由的斗争都必然会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稳定。你怎么能把我們的斗争看成是例外呢？

“我并不怕疏远我們解放运动中的白人朋友。如果他們真正相信自由，他們就不会对我们脱离曾把我們引入迷宮的老路有所不满。如果他們是不誠懾的，那么他們不过就像钻进我們队伍里的特洛伊木馬一样，站在他們曾經假装憎恨的事物的一边，阴險而恶毒地打击我們而已。如果他們不願意我們真正得到解放，他們就会因为我們沒有进入他們的迷途和陷阱而憎恨我們，这些迷途和陷阱是他們为了阻止我們达到預定的目的地而設計出来的。他們暢談容忍，但是他們对那些不願充当他們的傀儡和唯唯諾諾的湯姆叔叔的美洲黑人，却表現出了极度的不能容忍。

“你問我，一个美國黑人旅行者在古巴听到不断地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时作何感想，这真有点奇怪。沒有人問过我，当你經常遇到‘只限白人’的标记时你有什么感想。这些标记的意思就是‘要白人，不要有色人！’沒有人問过我，当你看到黑人由于坐了一下‘只限白人’坐的板凳而被警察当作重犯从大街上拖到监狱里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当我听到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时，联想到我在美国压迫下度过的一生，我深受感动地参加了这个解放的大合唱。我知道这口号并不适用于我，因为‘自由世界’的白人基督徒早已把我排斥在一切‘美國

的'东西以外。

"当你不能对偉大的保罗·罗伯逊为美国‘黑人’的斗争所作的偉大貢献給予正确評价的时候，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錯誤。保罗·罗伯逊生动地证明了美洲黑人沒有必要把美国看成是‘黑鬼天堂’和我們在地球上的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地。保罗·罗伯逊生动地证明了别的文明社会为了‘自由美国’加以咒罵、迫害和仇視的事情而贊揚和尊重黑人。保罗·罗伯逊已經证明所有的黑人都不是可以拿三十块銀币收买的那种人。他已經点起了一支为新一代照亮道路的火烛。

"是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要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是整个种族所关心的問題。我的事业和亚洲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是一致的，是和非洲人反对白种野蛮人的事业一致的，是和古巴反对白人至上的帝国主义的事业一致的。只有我在人类正义的基础上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以后，我才能看到團結一致反对外来干涉的共同事业有实现的可能性。"

* * *

我不要給人留下一个印象，好像我是反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是爭取自由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而且我还要設法加强它。我认为当我们自己國內有一大堆值得担忧的东西时，他們不應該为古巴的事情而忧虑。他們和我一样地清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我们請求帮助和保护的呼吁漠視到什么程度。

弄虛作假和花言巧語

我前面已經說过，当我们封閉了游泳池以后，門罗的种族主义者更加瘋狂了。就在同一天，我們回家以后，一个暴徒把一个

黑人从他的汽車中拖出来，拉到树林里。他們打他，把他捆在树上，威胁着要枪毙他。我通知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这个人被綁架了，我也通知了司法部。很明显，正当这些暴徒們准备用枪打他的时候，警长出現了，并且救了他。警长怎么会知道他能在树林里找到他呢？事后这个黑人虽然认出了一些企图使用私刑的暴徒，但是他居然不能对那些殴打了他的任何人起訴。联邦調查局拒絕對这次綁架提出起訴。

种族主义者經常夜間出現在黑人居住区，鳴枪鬧事，我們有几次开枪还击。一天夜里，他們在一个州国民警卫軍的尉官的指揮下向我的住宅发动了一次武装襲击。这个尉官被认出来了，但是沒有受到任何制裁，警长根本否认曾經发生了枪击。我們向聯邦政府提出了控告。当时每天夜里大約需要二十个自願者担任警卫——这些人自願睡在我的家里担任警卫。这是防止种族主义者攻击的唯一的办法。電話鈴时刻响着，有时候每隔十五分就有一次威胁我的電話。

后来我通过我的通訊《十字軍战士报》，呼吁各地讀者向美國政府，向美國司法部，抗議在門罗沒有实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抗議地方官吏、联邦調查局夏洛特地方分局和北卡羅來納州的州长阴谋不让門罗的黑人享受宪法賦与他們的权利。

《十字軍战士报》的一位讀者写信給代表康內提克州的國會議員考瓦爾斯基，这个議員又写信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他說，当他知道門罗发生的非法事件以后，他十分惊讶。他說，正当美国自称是世界上民主的卫士的时候，这将給我們的国家带来多么大的損失。这位國會議員要求进行調查。但是美國司法部不顾各地寄給它的所有信件和电報，竟沒有进行調查。他們所作的唯一調查就是問了一問我們的警长这些事情是否屬实，警长向他們保证，这些都不是事实。

最后，我到聯邦調查局夏洛特分局，向他們提交了一份長篇報告，要求對警長不讓居民享受第十四修正案賦與他們的權利一事，由聯邦政府提出公訴。報告雖然送去，但是聯邦調查局並沒有給我任何答復。不久，有一位記者告訴我，他從司法部聽到他們曾声称他們沒有在門羅找到任何違反第十四修正案的證據。他們本來就不打算答復我。

在這個時候我又接到美國國務院的一封信。在這封信里，他們剝奪了我和我的家屬到古巴去旅行的權利。古巴曾邀請我們去參加“七·二六”慶祝會。他們拒絕我的理由是，“因為美國和古巴的外交關係斷絕了，美國政府對訪問古巴的美國公民無法採取正常的保衛措施。”

這種假裝關心保護我的安全的借口是天大的胡說八道和典型的弄虛作假行為。在前三個星期當中，我的生命就已經受到過無數次的威脅和四次謀害，那些受到地方官員支持和鼓動的謀殺未遂的凶手，由於聯邦政府官員有意識地對他們保持沉默而得以逍遙法外，這些聯邦政府的官員也就是我曾經不斷地向他們要求採取“正常的保衛措施”的那些人。聯邦政府絲毫也不關心保護我和家屬的安全，因為他們在國內已錯過了很多保衛我的機會。

以上這些事情都是在我被迫離開門羅的前一個月發生的。

第四章

非暴力助长了种族主义者 的气焰：恐怖的一周

在我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中，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我
們在进行着一場深刻、激烈的反对种族主义者的斗争，我們需要
尽可能地使更多的黑人参加进来，尽可能地使这一斗争更富有
意义。我們感到，单单一个游泳池的問題对我們的需要來說未
免太狭窄了，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个特別注重职业、福利和其他經
济要求的广泛綱領。

我认为这是向前迈了重要的一步。“自由乘客”和入座示威
运动的斗争已經集中到一个单一的目标上：在便餐台吃饭的权
利，在公共汽車里随便入座的权利。这些都是重要的权利，他們
不給黑人这些权利就是对黑人个人尊严的直接侵犯。对种族主
义者來說，保持这些种族隔离的表面形式是重要的，这創造了
支持这种制度的气氛。他們所以这样地在一些个人的小事情上
贬低和挫伤黑人，其目的就是要侵蝕黑人的尊严和荣誉，而这种
尊严和荣誉是向种族主义制度进行挑战所必須的。但是种族
主义的基本核心不止在于气氛而已，这种核心可以用金錢和失
业的百分比来衡量。所以我們决定提出一个包括游泳池和工作
問題都在內的綱領。

門 罗 綱 領

1961年8月15日，我代表我們的分会向門罗市議会提出

了一个十点綱領，內容如下：

請願書

我們，簽字的門羅公民，請求市議會運用其影響努力作到：

1. 劝導本县的工厂招收工人时不加歧視。
2. 劝導地方就业机构給予非白人与白人同样的权利。
3. 指示福利机构給予非白人与白人同样的权利、照顧和关怀。
4. 在門羅溫契斯特大街建筑一个游泳池。
5. 清除一切把門羅划分为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地区的标志。
6. 指示总学监至迟在 1962 年必須准备在市立学校中消除种族隔離。
7. 为所有在校儿童提供足够的交通工具。
8. 正式請求州卫生局允許艾伯特·E·佩里博士在門羅和本县行医。
9. 市政府任用黑人担任技术和管理工作。
10. 立即实行以上所有的建議，并把你們的行动通知委員會和公众。

(签字)

羅伯特·F·威廉

艾伯特·E·佩里医学博士

約翰·W·麥克道

我們要求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是十点綱領 中最重要的一項。当时有很多工厂从北方迁来，——这些企业是为了躲避工会和在南方寻找廉价劳动力从北方逃来的。他們从当地工业发展委員會接受了数目可观的減稅优待，但他們不雇用黑人。事实上，頑固不化的地方官吏曾經充分地运用他們的职权来阻撓黑人就业。他們甚至作出了这样的規定，凡是新的企业都不得雇用黑人，否則他們就不能享受特別的減稅优待，而这种优待是通过向我們所有的人抽稅才有可能的。这等于隨便納稅，這是我們最不滿的一點。

执行这种种族主义政策的結果，在大約三千个門羅的美洲

黑人中就有一千个失业者——这些人甚至連个看門人、女仆或搬运工人的工作都找不到。即使找到当女仆或搬运工人的工作，每星期工作六天，最多也不过赚十五块錢。摘棉花是可能找到的少数工作之一，每摘一百磅棉花才給两块五毛錢，要拚着命摘一整天，远远超过八小时，才能摘一百五十磅。实际上，門罗的每个中学和大学里的黑人毕业生都只好到外地去找工作。白人毕业生就不必这样。黑人甚至于每逢夏天就要被解雇，以便白人青年大学生可以在本地找到工作。每年的夏天在我們的大街上聚集着很多剛离开学校的黑人青年。他們既得不到足以糊口的工作又得不到有益的文娱活动。

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我們相信基本的病症是一种經濟病；我們被剝奪了享有可以糊口的生活水平的权利。

“自由乘客”來到了門羅

我們會計劃在县法院四周組織一条糾察綫，以便引起他們對我們綱領的注意，迫使他們實現这个綱領。在这个时候，有十七位“自由乘客”前来支持我們的斗争，这恐怕是他們第一次參加为了爭取實現我們綱領中提出的那样具有根本性的要求所进行的斗争。在此以前，就像我已說过的那样，我們的目标虽然重要但終究是表面文章，容易滿足于細小的妥协。例如，我們曾經贏得了在公立图书馆实行种族合一。在这些表面事情上，入座示威运动的领导人是能够同市和州的当局打交道并且获得一些让步的。我相信这是整个黑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当这些让步被黑人“領袖們”当作據說美洲黑人正在取得的惊人进步的事例来进行宣傳，因而轉移了对根本的症結的注意力的时候，那么，这些胜利就連表面文章也說不上了，它們变成了自找失敗。但

是當我們认真解决根本的症結的时候，种族主义者是寸步不让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到門罗来的“自由乘客”遇到了这样赤裸裸的暴力和殘酷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他們作了非暴力的保证。

“自由乘客”反映了某些黑人領袖們的态度，他們說：全是我把事情搞坏了，他們將教会我們如何不用暴力来取得胜利。馬丁·路德·金牧师派保羅·布魯克斯牧师和他們一起来，充当“自由乘客”的“智囊”；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将同居民区合作，帮助这个区的黑人发展非暴力的技术和战术。我虽然不同意他們的立場，但是願意同他們合作。居民区給他們租了一幢房子，为了对他们表示敬意，这幢房子被命名为《自由之家》。我們有一些在上一个月里参加过游泳池糾察綫的英勇的青年參加了他們的活动。他們共同組成了門罗非暴力行动委員会。

虽然我自己拒絕參加非暴力宣誓，但是我要求居民区的人民支持他們和他們的非暴力斗争。門罗的学生参加了非暴力宣誓，答应遵守非暴力紀律，这种紀律和其他一些原則都禁止进行自卫。我还声明，如果他們能够让我看到用非暴力的方法可以从种族主义者那里取得什么成果，我也願意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

同时，有几个来門罗参观的人，他們要亲眼看看尤宁县的所謂民主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們知道，生活在我国其他地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很难相信，在美国，特别是在像北卡罗來納这样一个被认为是“进步”的南方州，种族主义这样猖獗，存在这样的野蛮和殘暴。因此，我們鼓励这些人來訪問。美洲黑人青年作家和門罗的老朋友朱利安·梅菲尔德来到了这里。一位从英國达腊姆城来的年輕的交換留学生康斯坦斯·李維尔到我家作客，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梅·馬洛里夫人（她曾經积极主張在她自己所居住的紐約城实行真正的种族合一）。

在門羅非暴力行動委員會組成糾察線的第一天，“自由乘客”似乎深信他們正在取得真正的進展。一位剛從糾察線上回來的“自由乘客”非常興奮。他說，“你看，今天我在城里參加糾察的時候，有一個警察對着我微笑。”我大笑，並且告訴他不要重視那件事，因為那個警察也可能是為了在想怎麼用最好的辦法殺死他而微笑的。康斯坦斯這位英國交換留學生，參加了糾察，她說，“哦，我認為這些人並不那麼壞，我想你可能是不知道怎麼樣和他們相交。我今天在城里注意到他們是以友好的眼光來看我的。”我對她解釋說，這些人由於期望她和其他的人離開門羅，所以試圖把她和其他的人爭取過去。當這些人理解到他們不能把“自由乘客”爭取過去的時候，那麼他們的本性就要表現出來了。幾天以後，康斯坦斯·李維爾被門羅警察逮捕了，她被控告“煽動暴亂”。

种族主义者是用暴力行事的

到第三天，一些市民開始對參加糾察線的人員進行侮辱，他們的彬彬有禮變成了慘无人道。一個警察把一位糾察人員打倒在地上，並威脅著要搗毀他的照像機。還有一位糾察人員被逮捕了。白人群众一直在叫罵；當一位白人“自由乘客”對叫罵的人報以笑容的時候，兩個門羅的“純粹的白人之花”向他的臉上吐唾沫。形勢越來越緊張了。

第四天，一位白人“自由乘客”在城里的大街上受到攻擊，被三個白人毆打。警察把他們驅散了，並且答應逮捕曾經攻擊這位“自由乘客”的白人。於是，“自由乘客”認為有可能法律會保護他們，因為他們曾公開聲明他們自己是非暴力主義者。我告訴他們，他們是和平主義者，這倒是沒有什麼，但是他們不應該

向全世界宣布这一点，因为那样会招致全面的暴力攻击。在过去，我們沒有任何人成为他們开始体验到的这种暴力行为的牺牲品，因为我們事先就显示出了战斗的决心。我們也曾經組織过纠察綫和入座示威，沒有人曾成功地攻击过我們的纠察綫。但是，他們說他們的斗争是从道德观点出发的。

星期五，一位白人“自由战士”在参加纠察綫时，被高压汽枪击中了肚子。这件事正好发生在警察的眼前。那一天，市里向纠察綫噴射杀虫水，希望能把学生驅离纠察綫。同时，市里通过了一条特別法令，命令參加纠察的人員要經常保持十五英尺的距离。他們必須保持这样一个距离；他們既不能离得太近，也不能离得太远。然后警察就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策略：他們先让一位纠察人員停止前进，当后边的一个人繼續走过来的时候，他們就逮捕他，說他在別人后面离得太近了。也是在同一天下午，一个十岁的黑人儿童在城里受到三个白人的攻击，因为他們曾看到他参加了纠察綫。沒有一个攻击者遭到逮捕。

“你还没有死嗎？”

那一天晚上，“自由乘客”乘車越界到麦克林伯格县去，他們在一个饭店里歇脚。他們被人认出来了，并且受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在混战的时候，一个“自由乘客”不得不跑到树林里去躲避；別的人乘車逃跑了，把他一个人丢了。我們通知門罗警察局、我們县的警察局、夏洛特警察局和麦克林伯格警察局，有一个“自由乘客”在树林里迷失了，种族主义者正要捉拿他。我們恐怕他要受到私刑。我們要求他們出来制止这件事，門罗警察局拒絕了，尤宁县的警察局也拒絕了。

布魯克斯牧師訪問了州長辦公室，據說州長特里·桑福德不在，但是布魯克斯牧師得到了一個同州長第一助理休·B·坎農談話的機會。他向坎農訴苦說，“自由乘客”得不到警察的保護。州長助理却談論起羅伯特·威廉來了。布魯克斯牧師說他不是來談羅伯特·威廉的，他是來談一個失蹤的“自由乘客”的。他說他們是和平主義者；他們是非暴力主義者，他們要求警察的保護。這位州長助理休·B·坎農說：“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和平主義者，你最好從門羅滾出去，因為那裡就要發生大量的暴力行動。”

布魯克斯牧師一再試圖向他請求警察保護，但是他終於放棄了。他說：“你談論了這麼多關於羅伯特·威廉的事情，他就在这里。你要找他談話嗎？”這位州長助理說，正是如此。

我們在兩個星期以前就談過話，當時我要求州的警察保護。州長派了一位名叫拉金斯博士的湯姆叔叔式的人物充當談判的代表，這個人被認為是州長的智囊，他來到後和我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討論用什麼辦法把事情平息下去。我把十點綱領交給了他，這個綱領使他很震驚。他說，這個綱領包括得太廣了，要求太高了，但是不管怎樣，他將把綱領交給州長。他还說，他了解我一直受到經濟壓力，這很不好。只要我們不再在這一地帶鬧事，我就可能找到一個工作，州里可能幫助我。

當我回訪州長辦公室，並且把这个收買的陰謀告訴休·B·坎農的時候，他回答說：“你的意思是要告訴我，你還沒有死嗎？”我告訴他“沒有，我沒有死，還沒有死，但是假如我要死的話，一大群人將和我一起死。”他說：“哼，你現在沒有死，可是你就要被人殺死的。”我告訴他，為了避免流血事件，我們要求保護。他說：“假如你要想避免流血，你就不應該鼓動鬧事。”

州長和聯邦調查局

就在這個星期五的晚上，當保羅·布魯克斯牧師和休·B·坎農談完話以後，坎農說他要找我談談，我接過電話，將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你看，你正在自作自受。你要求暴力，現在就讓你得到暴力。”我告訴他，我並不是為了我自己才向他呼呼的，我是為了一個和平主義者才向他呼呼的。我並且告訴他，“我也不是為了一個黑人向他呼呼的，我向他呼呼，是由于一個白人青年在樹林里失蹤了。”他說，“我不管他是誰，你主張暴力，現在就讓你得到暴力；你正在自作自受。”我告訴他，“你知道嗎？……你是全世界最大的傻瓜！”他惱火起來，開始在電話里大罵，他要我閉嘴。我告訴他，他雖然是州長助理，但是他不能命令我閉嘴。他說：“假如你還這樣對我講話，我就要挂電話了。”後來他還是挂斷了電話，沒有給我們任何保護。

每當“自由乘客”準備組織糾察線的時候，他們就到夏洛特聯邦調查局去請求保護。聯邦調查局總是說，“我們这就去。”但是出事的時候，他們從不在場。星期六，當“自由乘客”正在城里糾察的時候，曾經運送他們到糾察線去的出租汽車準備把他們載回來，但當地的白人種族主義者集合起來堵住了去路。這就意味着“自由乘客”必須走回離此將近一英里遠的黑人居住區。暴徒沿街追逐着“自由乘客”，用石子扔他們，並且威脅着要殺害他們。當他們進入了黑人居住區以後，沒有參加糾察線的黑人騷動起來。他們對那一群追逐“自由乘客”的暴徒侵入我們的居住區感到非常惱怒。很多黑人用石头扔他們的汽車，就这样把白人種族主義者打了回去。

第五章

自卫防止了屠杀：种族主义者 制造的绑架骗局

星期天早晨，警长和他的部下坐着汽車到各处去，号召本县的白种人到城里去殴打“自由乘客”。此外，还有人从别的县和南卡罗来納州赶来。有一个名叫“义勇队”的团体也把人带进了城来。

到下午，数以千計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来到城里，聚集在法院的廣場上。到了四点钟，一位糾察队长詹姆士·富尔曼跑到我家里来，要求我在一个钟头內派出四辆出租汽車。他說种族主义者正在揚言向糾察綫进攻，他还抱怨警察当局对此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在一小时之后，富尔曼的头被打破了，而且被关进了牢房。

在四点三十分的时候，黑人出租汽車公司打电话報告我說，車辆无法开到糾察綫去，因为通向城里的每一个路口都被封鎖了。几分钟以后，由我們的人駕駛的兩辆车飞快地赶到我們的住区，他們是剛从城里設法赶来报告情况的。他們說暴徒已經向糾察綫发动攻击，已經开了枪，城里已处在大混乱之中。

到这时为止仍站在法院廣場远处的自卫队，一听到“自由乘客”們和当地非暴力主义青年們的生命处于危險之中，立即跳进他們的車子，突破了暴徒的封鎖綫，直往城里駛去拯救糾察人員。同他們一起去的是朱利安·梅菲尔德。

白人暴徒早已武装起来。可是警察却解除了要想去搭救

“自由乘客”的某些人的武装，并且把这些武器轉交給暴徒。那位英籍交換留学生想进入由三个武装黑人駕駛的一辆前去搭救的汽車，警察和暴徒企图加以阻拦，于是在糾察綫爆发了战斗。警察扭住了黑人，让白人种族主义者殴打他們。开始，挨打的都是“自由乘客”和当地主張非暴力的学生，但是很快全城的暴徒都被煽动起来，黑人不分皂白地遭到毆击。暴徒正在集結起来对我們的黑人居住区发动进攻。

我們的目的是为了自卫

許許多的“自由乘客”和黑人被逮捕了。为了騰出地方来拘押他們，許多應該依法論罪的人却被从牢里放了出来。他們当中很多人告訴我，被拘留的学生們在牢里流血，有生命危險而得不到任何医疗。我打电话給警长，告訴他有人向我報告学生們在牢里得不到医疗，而且他們的生命在危險中。我告訴他，他必須在三十分钟內让学生們得到医疗。如果在三十分钟內这些学生仍得不到医疗，我們將向牢房发动进军。大約在十五分钟之后，詹姆士·富爾曼从医院里打电话告訴我，他們得到了医疗。緊接着，朱利安·梅菲尔德回來了；他报告說，白人暴徒，还有一些武装警察，正在铁路綫附近对着逃出城来的黑人开枪。天快黑的时候，白种人驅車經過我們的居住区，他們大叫大嚷，有些人还从車里往外放枪，用东西投擲街上的人群。許多黑人开始武装起来，相互交換枪枝和商借彈药，組成值夜的卫队来防止正在城里集結的暴徒的襲击。在我居住的那个街区，有三百个人在街上四出巡邏。

傍晚大約六点钟的时候，白人布鲁斯·史铁格耳夫妇来到我們的街区。人們认得，史铁格耳夫妇就是昨天坐着汽車到城

里去的，車上还挂了一面种族主义者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句口号：“猎黑季节”，意思就是說，这正是屠杀黑人的大好时刻。

人們曾經問，为什么一个种族主义者要在那个星期天把他的妻子帶到我們那个十分混乱的居住区来呢？但是对那些熟知三K党的襲击性质的人來說，这并不稀奇。許多南方的种族主义分子把白人妇女看作是一种保險方式，因为按照古老的傳說，一个黑人是應該会被一个白人妇女吓倒的，是不敢冒犯她的。白人在进行三K党式的襲击的时候，总把妇女帶在一起，因为那样就可以在事态到了发生战斗的时候，让人看到是黑人侮辱了妇女，三K党徒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妇女們的保护人了。史铁格耳夫人就是这样被她丈夫帶在一起作为保險物的。他們想来看看那天夜里我們在怎样准备防御。

在街头巡邏的黑人咆哮起来了。他們中間有些人在城里挨过打。他們的孩子有一些失踪了，有一些被关进了牢房。史铁格耳的車子一进我們的街头，就被认了出来，在我們枪口的威逼下，在离我的住所不到一条街的地方被逼停了下来。我那时正在屋里接听来自全城各个地方的電話：有的是家长要找参加这次示威的子女的；有的是黑人报告他們挨打的情况，問我有什么办法、該采取什么行动的；有的是黑人自願參加战斗，表示願意參加武装队伍来保卫我們居住区的。当我听完了電話以后，我就到我的屋子后面去，准备把防御綫在天黑以前建立起来。

当史铁格耳夫妇被拦住以后，他們被人們从車里拖了出来，并被帶到我的院子里。有人叫我出屋子去。我走到房外，看見一大群人圍在史铁格耳夫妇周围。我看到这些人是多么憤怒，我又看到史铁格耳夫妇周围的人群正在越縮越攏。我知道只要有一个人失去了控制，史铁格耳夫妇就会被杀。我把人群从史铁格耳夫妇四面赶开去，强迫他們退到接触不到的地方。

史铁格耳夫人說，“我們已被綁架了！”她不斷地重複着這句話。我說，“女士，你並沒有被綁架。如果你願意，你隨時都可以離開這裡，但是你必須穿過這些人群，這些人是發怒了。”她站起來望望人群，說：“你應該把我們從這個地方帶開。你能夠把我們帶出去。如果你帶我們離開這裡，他們就不會為難我們了。”我說，“女士，我並沒有把你帶到這裡來，我也不會帶你離開這裡。你們本來知道這些人都是會在這裡的；你們知道城裡發生了什麼樣的騷亂，而且你們應該知道這裡的人們被激怒到這種地步，最好還是不來為妙。我們現在正忙於保護我們的家庭。我正在設法建立一道防線，沒有時間來和你糾纏。那是你的事。”

我們站在那裡講話的時候，在我們頭上飛過了一架飛機。這架飛機如果不是三K黨所派，那就是保安執行部派來的。他們經常使用輕型飛機，而且我們經常接到電話威脅我們，說要從空中來襲擊我們，因為我住的房子防護得太好了，他們無法從地上得到我。所以當這架飛機在我住的屋子上空盤旋的時候，大約有十五個配備著.30口徑的遠射程來福槍的人對準飛機開了火。史鐵格耳夫人曾經十分憤怒和傲慢，但是她一看見這種情景，就認識到情況是多么嚴重；這些人已經被激怒，真會說干就干的。她渾身發抖，幾乎變成了神經質的。那時正好有一輛坐着白人的汽車路過，而且還放着槍，大約有二十個人開槍回擊了，你能够看到子彈擊中汽車發出的火星。這一點史鐵格耳夫人是能够看見的。

我轉身向屋裡走去。人群嚷叫着要把史鐵格耳夫婦處死。當我跨上前階時，史鐵格耳夫人緊靠着我的身體走着，她的丈夫則緊挨着她。他們跟我一起進了屋，但是所有的人群仍在嚷叫着要把他們處死；有一個人還懇求別人給他一枝槍，并且一再要求允許他前去把他們殺死。

人群中有些人是我以前从未見过的。他們來自县城以外的地方，來自別的城鎮，也有人打长途電話來表示願意參加當時正在組織起來的自衛隊。但是所有經常和我保持聯繫的人和守衛的人都在我房子後面，因為那就是我們集合和存放那天夜里我們所需的槍枝和彈藥的地方。街上都是大群被激怒的和被卷進來的黑人。他們並不屬於任何組織，任何集團。他們只是受盡了压迫而武裝起來的個別公民。

我去接電話了。我的妻子給了史鐵格耳夫人一個椅子。當我回來時，這女人還在喋喋不休地說，“如果你們帶我們走出這裏，我們就走。”我又一次告訴他們，我沒有時間帶他們走出去。我告訴她說，如果我在同樣的情況下被困在她的居住區，我早就沒有命了。我說，“你瞧，我們還沒有你們的人一半那樣殘酷。”她承認我說的話是對的。她告訴我，她是一個經常去教堂作禮拜的基督徒，她要幫助我們，她願意做些她能够做的事。我告訴她，她的丈夫能够幫助我們。她的丈夫說，他不知道他能做些什么，因為他們是住在馬歇爾城的，在門羅城里沒有什麼名望。她繼續說，“你就是羅伯特·威廉！”我告訴她，是的。她說，“唷，我以前從未見過你，但是我聽見許多人談起過你。”我說，“那一定說的都是些壞話。”她說，“是的，我必須承認那都是些壞話。但是你並不是他們所說的那種人。你看起來像是個好人。你比我過去所想的要好得多。”

電話又响了。這是警長曼尼。他說，“羅伯特，你已經在這個城里引起了許多種族糾紛，但是州的部隊來啦。在三十分鐘內，你就要被吊死在法院的廣場上了”。

他挂了電話。又有別人打電話來說，電視台廣播了一個消息，州政府正在派軍隊來包圍這個城市。另外有一個女人打電話來說，她看見軍隊在向城里移動，公路上的巡邏隊正在把他們

的車子停在監獄的後面。這件事為一則廣播新聞証實了。於是我們的同伴中有一个人把我叫到了門口。我走出門去，到了街上。我朝四面一望。街的兩頭都被警車封鎖住。我明白了，他們是要在州里派來的部隊抵達以前，騙我等在這裡。我告訴我的妻子梅舊爾，我們必須離開這個地方。我說她沒有時間取什麼東西了，只能把孩子帶走。我把朱利安·梅菲尔德叫了來，他是剛在史鐵格耳夫婦跟我進屋後走開的。我告訴他州里派來的部隊正在向我住的地方移動，我勸他立刻離開門羅，以便萬一我出了什麼事的時候，有人能夠自由地把事情的始末告訴全世界知道。說罷我們就走了。

是逃亡，但不是亡命之徒

大多數人認為我們出走是为了要逃脫法庭的公訴。但是在那個時候根本沒有對我提起公訴的可能。要記得，我是在知道我曾經救了史鐵格耳夫婦的情況下離開門羅的。我們的逃亡是由於州政府的態度，是由於警長的態度，是由於無法無天。在我們抵達紐約，聽到廣播台和電視台的消息以前，我們並不知道對我們提起了什麼公訴。我們是在离开了北卡羅來納後直接奔向紐約的。起初我想我們會在那邊留下來，在哈勒姆黑人區逗留一個時期，然後就在那裡迅速開展一個運動把門羅城發生的殘酷的種族壓迫告訴全世界。就是為了這個理由，我離開了北卡羅來納州；因為只有從州外面我才能集中力量搞宣傳運動，給門羅城寡不敵眾的黑人和“自由乘客”以幫助。我是在警長打電話告訴我州里派的部隊將要來到，並且要在三十分鐘內把我吊死在法院廣場之後才離開北卡羅來納的。我記起了當我向休·B·坎農呼籲按法律給予失蹤的一位“自由乘客”以保護時他所說的

話。這位州長助理告訴我，不論是什么人，他也不管；他說我們既然要求暴力，那就讓我們得到暴力吧。他想知道，“为什么我還沒有死！”我在當時并沒有想到有什么涉及訴訟的事情。

我第一次听到公訴的事是在紐約，當時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說，到处都是緝拿我的公告，說我因为綁架史铁格耳夫妇而被尤宁县的大陪审团提起了公訴。

聯邦調查局声称，它之所以介入这个案件是因为我是一个被法庭提起公訴而越州逃跑、企图躲避公訴的亡命之徒。但是从技术观点来看，聯邦調查局是錯誤的，因为那天夜里我很早——大約九点钟——就离开了，第二天大陪审团对我提起公訴的时候，我已經在紐約了。当然不能說，我是作为一个被提起公訴的亡命之徒而越过北卡罗來納州的州界的。

但是只要想一想州政府曾經加在我头上的那种完全莫須有的綁架罪名，就可以知道聯邦政府对我指控中的这种技术性錯誤并不奇怪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可以“合法地”在美国全国对我实行通緝。在这里提一下紧接着我离开門羅城后所发生的事是很重要的。我是根据两个警察的证詞而被提起公訴的（法院沒有任何記錄說史铁格耳夫妇曾經在大陪审团前出庭）。在法院发出拘票以后，約有一百名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官員，以及武装着机关枪、来福枪、彈压枪和催泪彈的当地警察襲击了我的住所。他們不知道我已經走了。他們不能相信我居然能逃出他們的手。

我是在紐約的報紙上讀到大陪审团的公訴书的。同公訴书一起登在报上的是記者訪問史铁格耳夫人的报道。我不知道，史铁格耳夫人是否在法庭上出現过，她最后究竟向大陪审团說了些什么；但是我确切知道，她讲的話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她从未把同样的話說过两遍。

第二天，我在《紐約郵報》和《紐約時報》上讀到的新聞報道說，當他們追問史鐵格耳夫人時候，她說我曾經申斥綁架她和她丈夫的人群。但是她又在下一段話里說，我是這些人中的首領，因而我對這件事負有責任。我再往下讀，看到她說，他們曾經被捆綁在我的屋子裏，我們的槍口對準他們的脖子，一直到我離開的時候，他們還被捆在那裏。但是在說了他們被捆綁的話之後，她又說，他們被我釋放了，沒有受到傷害，而且在一個半鐘點以後就離開了那個地方。

同時，她首先為他們進入黑人居住區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她在一家報紙上說，這是因為他們要走一條近路，而在另一家報紙上又說，這是因為他們迷了路，不知道往那裡走。但是那裡並沒有穿過我們居住區的公路。史鐵格耳夫婦要假道回到馬希維爾的那條公路離開我們住的那條並不通行的街道約有一英里之遠。任何一個熟悉本縣情況的人不可能在那裡迷路的。史鐵格耳這個女人還對一家報紙的記者說，我所住的那所房子，我在那裡出生的那所房子，是她父親賣給我父親的，而且她本人也曾在那裡住過。瞧吧，在所有這些報道中，說話的總是史鐵格耳夫人，你能看到的總是史鐵格耳夫人的相片。他們從未讓史鐵格耳先生這位有名的三K黨人說什麼話。

我还讀到過《夏洛特觀察家報》的一則報道，這則報道引用了史鐵格耳夫人的話說：“威廉只是假裝幫助我們。”那末，她是怎樣知道的呢？我曾經幫助了他們的一個最好的證明就是，他們沒有受到傷害，而且還活着。這他們是知道的。

第六章

門羅事件：迫害黑人的陰謀

在北卡羅來納州門羅城曾經發生並在繼續發生的事情，說明一個古老的真理：為所有的人所共同使用的言詞，對於所有的人並不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人們曾經因為一個共同用詞的意思有分歧而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白人種族主義者相信“自由”，相信“公平的審訊”，相信“公道”。他真誠地相信這些詞，並且以很大的感情應用它們，因為對於白人種族主義者來說，這些詞意味著他有剝奪黑人的基本人權的自由，他們的法院的所謂“公平審訊”和“公道”，就是維護種族主義者狂妄的白人至上思想的法律程序和判決。在許多緊急的場合，當我們根據憲法所享有的權利被否認、我們的生命遭受危險時，我們曾要求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調查門羅的情況，保護我們的生命和恢復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換句話說，就是主持公道。他們總是拒絕了我們的要求。

司法部——“極端危險和精神分裂”

美國司法部的行動表明，它在門羅煽動迫害黑人的共謀罪方面並不稍逊于三K黨。在我們離開門羅後，美國司法部勾結警長A·A·曼尼，散發了二十五萬張“通緝”公告，在這些公告上，他們把我描寫成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們說我精神分裂，却不能講出誰曾對我進行過精神分析。難道他們是根據門羅的那個

半文盲的警長的分析而认为我是精神分裂的嗎？

司法部散发的这些公告又把我說成是“极端危險”的。但是，他們拿不出任何確凿的事实。他們拿不出任何犯罪記錄。他們舉不出任何能够表明这个罪状的事件。他們无法說明我曾經伤害过哪一个人。因为他們知道这些都是謊話。那末，美国司法部怎能干出这些事来呢？怎能怀有善意呢？它沒有調查事实，也沒有調查这些恶毒的謊話的来源，就在美国全国散布这些謊話，怎能算是一个公正的調查机关呢？

在他們的公告上有这样的“事實”：我的右眼有一个疤，我的鼻尖左边也有一个疤，我的左腿上也有一个疤。这些都是撒謊，但是这些捏造的所謂疤的可笑謊話把我描繪成一个“嗜杀好斗的黑鬼”或“极端危險”的人物。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司法部已同三K党合流。他們肯定我是逃不掉的，他們甚至过早地为在美国政府的慫恿下进行私刑吊打准备了借口。他們宣傳我将随时开枪杀人。这样，如果我被抓到而遭到枪杀时，就有了借口。

我逃到加拿大后，他們又把同样的公告傳給加拿大皇家騎警。非常有趣的是，他們在加拿大絕口不提北卡罗來納州曾发生种族事件这一事实。我的唯一罪状就是在南方为爭取人的权利进行了斗争。这的确是一个罪状；在南方，当一个黑人为他的人的权利而斗争时，的确是被认为犯罪的。有許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自从入座示威在南方开始以来，已經有五千个以上的黑人由于爭取他們的权利而被逮捕。南方的几乎所有勇于斗争的領袖都曾經坐过牢，他們的罪状只是爭取宪法賦予的权利和人的权利。

加拿大人不像美国白人成見那么深，因而司法部很怕加拿大人了解这个事件的全部真象，而拒絕合作。他們必須把我描繪成为一个綁票勒索的罪犯——这就是美国政府通过它的机关

美国司法部干的勾当。他們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是在加拿大藏匿的，并且是充分武装着的。

問題又来了：这些情报是那儿来的呢？是不是美国司法部跑去找了那个我要求他們提起控告的警长呢？就是那一位我曾告发过的警长嗎？就是他們都知道的自 1956 年以来一直是三 K 党的朋友、是我的敌人和黑人的敌人的那一位警长嗎？是不是他們跑去找了这个被三 K 党提拔的警长，向他要了关于一个美国民权战士的材料呢？看来，他們一定是这样做的。这件事情应当足以喚醒許多人认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司法部本身就是被种族主义者的影响所籠罩的一个机构，

如果我沒有能够逃出美国，我永远也不会去出庭受审，更不用說是受到一次公平的审訊了。

其他被告們

史铁格耳夫人報告說，我的家是一个“武器庫”。但是搜查的結果并沒有在我的屋里找到任何武器或彈药的痕迹。因此，警察把我的失踪作为搜查其他邻近居民的借口。他們把房子拆破，恐吓許多甚至沒有參加自卫队的人，整夜审問被認為是我的同伙的人們，沒收他們發現的武器——我們合法擁有的武器。

在我离开一天之后，那些出獄的“自由乘客”向《紐約郵報》和《紐約時報》发表談話說，虽然我不在，他們將繼續进行斗争，他們將繼續进行我們所发动的斗争。他們中有一个来自紐約的二十二岁的白人大学生約翰·勞里。在他宣称斗争将继续进行的两天后，他被捕了，罪狀是共謀。理查德·克劳德，一个当选为門罗非暴力行动委员会主席的十九岁的当地青年，和另一个十七岁的哈罗德·黎亚波一起也被提起了公訴。这些青年曾經參

加糾察線和入座示威，并在斗争中表现了领导的能力，因此他们也作为共谋犯而被提起公訴。在骚乱开始后才离开北卡罗来納州的梅·馬洛里，也被控犯了共谋罪，但当局沒有立刻逮捕她。

此外，曾参加所有这些斗争的另外两个当地黑人青年，十七岁的艾伯特·罗里和十五岁杰米·柯文頓，則分別被控开枪打警察，然而在門罗城除了一个警察受伤外，再也举不出第二个。杰米·柯文頓被送进感化院，艾伯特·罗里被判坐牢五年。这个案件尙待向最高法院上訴。

另一个在 27 日的骚乱中被捕的白人“自由乘客”，即来自紐約州布鲁克林城的理查德·格里斯沃耳德，当天在尤宁县的牢房里被另一囚犯打得几乎死去。行凶的是一个被控犯有伪造和殴打罪的白人囚犯。当时格里斯沃耳德已被打得滿身是血，半昏迷地躺在地上，幸亏另一个被捕的“自由乘客”在被带过那个牢房时救了他的命。这第二个“自由乘客”肯尼思·薛尔曼大声叫嚷，要求把格里斯沃耳德移出牢房以免被打死，看守者害怕这个白人学生死去会惹来麻烦，这才照办的。

第二天，所有的市、县、州和联邦的执法机关，为門罗的治安秩序得到恢复而互相打电报。骚乱发生后那一周，县专员公署給保安执行部的人员每人奖賞一百美元，作为“在門罗‘种族紧急事件’中特別服务的报酬”。

三个星期后，“援助門罗事件被告委员会”从曾同格里斯沃耳德住同一牢房的白人囚犯霍华德·斯塔克那里接到一張他亲笔写的供詞。斯塔克供认，他是在門罗警察局的指示下殴打格里斯沃耳德的，因警察方面答应替他消案，并立即释放他，作为交换条件。但是，斯塔克获釋两星期后又被捕了，并以所謂已被取消的同样罪状被判罪，因而他把上述供詞寄給“援助門罗事件被告委员会”。

康拉德·利恩把供詞原紙寄給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並要求立刻調查門羅警察局。司法部從來沒有承認收到了那份供詞。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曾到當地搜集口供，他們甚至訪問了斯塔克。與此同時，尤寧縣當局迅速把斯塔克送進精神病院。司法部最後通知利恩說，此案已結束。

苏联来福枪的怪影

不久，美國各報開始報道當地警官的談話說，當他們搜查我們的居住區時，他們發現並沒收了我們的秘密軍火庫：有鐮刀和錘子標記的蘇聯來福槍。他們暗示這些武器是由某種國際共產主義陰謀集團供給的，暗示有一批秘密武器從莫斯科直接運交給我們。這完全是誣蔑。他們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的許多來福槍是各國製造的。他們沒有報道我們擁有皇冠標記的來福槍和英國的剩餘來福槍。為什麼他們不把我們看成是希望在美國恢復帝制的英國女皇的代理人呢？他們也沒有提到我們擁有意大利製造的來福槍。他們沒有提及我們也有納粹標記的德國來福槍。這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武器，是毛瑟槍。應當指出，他們認為不值得提出我們有這樣一些武器的事。可能是他們喜歡納粹標記的來福槍。他們也沒有提到我們有來自美國陸軍的剩餘來福槍，上面有美國陸軍標記的M—1型來福槍。為什麼他們不想把我們看成同美國陸軍共謀造反呢？

他們只提蘇聯製造的來福槍，目的在於誣蔑我們的自衛運動。這是一種企圖喚起種族主義者的歇斯底里和企圖欺騙美國人民的伎倆。這是企圖把捏造的刺激人心的冷戰問題注射到我們爭取生存的鬥爭中去。這是企圖使美國人民認為門羅自衛運動是對他們的安全的嚴重威脅。

赤裸裸的事实是，从美国全国各地的陸海軍剩餘物資商店和一般的金屬品商店都能够买到这些来福枪。这些枪枝，包括上面有锤子和镰刀标记的苏联来福枪，都是合法买到的。我有购买这些苏联来福枪的购货单，上面注有这些枪的号码。

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秘密的供应处或隐蔽的军火库。我们曾组织了一个来福枪俱乐部，自1957年就取得了“全国来福枪联合会”的证书。我们被批准拥有来福枪。我们练习射击。在门罗还有另外三个白人的射击俱乐部。那些白人甚至有两个实行种族隔离的高级打靶场，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提到这些事实。

像《纽约邮报》这类报纸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嚷关于发现苏联来福枪的事情，但是他们却不提这些来福枪是从美国商店公开买到的。这些苏联来福枪并不是自动武器。它们是那种用于体育运动和射击练习的单发步枪，曾在1959年的世界运动会上用过。这种来福枪被称为6.53型，甚至苏联陆军也不用它。关于“苏联来福枪”的诬蔑成为一些喜欢危言耸听的新聞記者们害人的資料，可是他们对于门罗的警察武装白人匪徒攻击赤手空拳的学生的事件却认为没有耸人听闻之处。

我有一张从最近的《多伦多星报》剪下来的照片，图上是一些同“约翰·伯奇协会”^①有组织联系的法西斯组织“美国义勇队”的成员。照片显示“义勇队”正在伊利诺斯州接受训练。不是在密西西比州，也不是在阿拉巴马州或南卡罗来纳州，而是在伊利诺斯州。这些人配备了机关枪和自动步枪，包括约翰逊自动步枪，他们正在用美国陆军的六点五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在靶场进行实弹射击。他们从那里得到这些迫击炮的呢？他们从那

① 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1958年成立的一个法西斯组织。目前该协会在很多州设有分会，它的势力已逐渐扩充到美国国会、军队和其他部门。美国很多种族主义团体和法西斯团体隶属于它。——译者

里得到这些炮彈的呢？在美國沒有任何剩餘物資商店出售迫擊炮和真炮彈。他們從那裡得到他們的機關槍和自動步槍呢？其中許多是美國空軍還在使用的型號。這些武器不同於我們的武器，是聯邦法律明文規定平民不能擁有的自動步槍和機關槍。

這些人戴着標準的鋼盔，穿着美國陸軍的剩餘軍裝，唯一的差別是他們戴着他們自己的“義勇隊”的標誌。這些人招募了自己的私人軍隊；在門羅招募來攻擊“自由乘客”的五千人中有一部分就是這個法西斯組織“義勇隊”的成員

沒有人對此不安。這些對美國人民的幸福和安全那麼關心的滿紙虔誠的報紙，竟然對“義勇隊”被引進門羅一事只字不提。這些“義勇隊”裝備有重武器並在野外受訓。原因何在？為什麼在美國竟容忍這種現象呢？那些“義勇隊”自稱他們動員起來是为了抵抗共產主義或共產黨可能對美國的入侵。哪有一個美國人那麼傻，真的相信美國海軍陸戰隊、陸軍、海軍、空軍不能遏止的入侵，竟會被來自約翰·伯奇協會的幾個穿球鞋的老太婆和她們的“義勇隊”所遏止呢？

不，任何能夠正常思考的人都看得出，那些種族主義的“義勇隊”武裝起來是準備大屠杀的。他們正在形成法西斯的先鋒隊，有朝一日他們將放手大干，攻擊所有越軌的美籍非洲人和美國白人，而所謂越軌就是勇于爭取宪法所賦予的權利。這些“義勇隊”將是那些骯髒勾當的人。正如在納粹的德國有一些專門用煤氣爐燒死猶太人的特種部隊一樣，在法西斯的美國也將有一些“特種部隊”用來對付“鬧事者”。這種勾當是美國武裝部隊干不了的，因為美國武裝部隊里有黑人，而“義勇隊”組織里是沒有黑人的。這就像阿尔及利亚有法国陸軍和秘密军队組織，在希特勒時期有正規軍和冲锋隊一樣。美國武裝部隊、警官和司法部將會不聞不問，他們會說：“我們很抱歉，但是我們不能抓

这些人。我們很抱歉，我們已尽了最大的力量来防止暴力”。那些“义勇队”的武器百分之百是美国的，而報紙对他們的活動竟找不到可以指責的理由。

但是，当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的門罗黑人英勇地起来保卫他們的房舍、家庭和生命的时候，報紙却嘲笑他們的自卫行动，誣蔑他們，暗示他們的武器是某种潜伏的共产党阴谋集团所供給的。

所有的美国人民，不仅是美籍非洲人，應該認識到，如果1961年8月27日在这个北卡罗来納州尤宁县的門罗城我們沒有武装起来，那就可能发生大規模流血事件。那些种族主义暴徒原来計劃要攻击黑人居住区，后来所以沒有勇气执行这个計劃，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知道我們已經很好地武装起来，因而使他們不敢妄想采用暴力了。

他們是这样一些人，既喜欢对人家采用暴力，又希望自己不会遭受暴力的反击。如果持和平主义的黑人一边面頰被打而又轉过另一边去，那正是他們所喜欢的。

我們为保卫我們的家所做的准备和所保持的武装警惕性，同“自由乘客”运动以及我們本地的学生在非暴力原則下所进行的纠察和示威行动完全是两回事。我們武装自己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卫。如果我們不會武装起来，我們可能已成为屠杀美籍非洲人的現代暴行的牺牲者。让報紙为我們有共产党标志的来福枪而痛哭悲叹吧。我不管来福枪上有什么样的标志，在1961年8月27日星期天那一天，它們是我們的法宝。

加拿大——隨后古巴

当我認識到，这不再是一个地方性事件，美国政府已插手进

来并且同三K党一样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我的时候，我决定离开紐約，我认为最好的去处是加拿大。

我觉得加拿大人民会同情我。我也記得，在美国奴隶时代，逃跑的黑人曾利用秘密通道逃到加拿大避难。所以我和我的妻子梅莉尔一起逃到加拿大。我觉得在加拿大是安全的。最初的几天，我过着正常的生活。我到处观赏商店的橱窗，参观过一次航空表演，去过公园，也去过海滨。似乎我是相当安全的。我觉得我有可能在加拿大住下去，因为我被控的罪状是捏造的。

一个早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家加拿大报纸的头版刊登了我的一张很大的照片。随照片刊登的新聞說，我是一个凶恶的綁票匪，美国司法部已要求加拿大皇家騎警抓我。它說我是一个工人，一个运貨工人。它沒有提到我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尤宁县分会的主席，它也沒有提到我曾編写并发行通訊。

加拿大皇家騎警发动了一次搜查，其恶毒凶猛的程度不亚于美国联邦調查局的搜查。由于許多加拿大人了解美国的种族情况而同情我，加拿大皇家騎警开始搜查住宅。他們甚至搜查多倫多一所教堂（并盘問牧师），就是那一所我在前一个夏天进行巡迴演讲时曾經去过的教堂。我終於肯定加拿大并不比美国安全。我曾和同情我的加拿大人一起拟訂了如果我在加拿大被捕怎样抗拒引渡的計劃。他們准备揭露加拿大当局企图把我送到殘暴、野蛮和实行种族压迫的美国南部。他們替我在加拿大聘请了律师，一旦我被捕，他們将立刻采取法律行动。但是，我幸运地离开了加拿大。

当我认识到我在加拿大并不安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去古巴的两次旅行。在古巴，一个黑人被当作人来对待，种族問題被理解，人民不会把我看成犯人，而会看成是一个被莫須有的罪状陷害的人。这种罪状的目的在于消灭那些勇于斗争的领导人。

他們已开始形成一个新的运动，一个爭取美籍非洲人彻底解放的新的富有战斗性的运动。除了古巴外，我想不出在西半球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

鉴于加拿大的整个东海岸都在美国联邦調查局和加拿大皇家騎警的監視下，我旅行到加拿大的西海岸，重新进入美国，轉到墨西哥，然后到古巴。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古巴的原因，我不能有其他的选择。

俄亥俄州长为虎作倀

在古巴宣布准許我政治避难以后不久，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避难的梅·馬洛里夫人被当地聯邦調查局的探子逮捕了。北卡罗来納州立刻要求把她引渡到尤宁县受审。

如果馬洛里夫人被引渡的話，她将同罗里、黎亚波和克劳德等在一起，并将在某一个日子在北卡罗来納州法院受审。在那里，他們不可能得到公道，特別是处在我已經描述的情况之下。全国各地人民的压力正在增长，許多人准备抗議这一重大的濫用法律的事件，因为起訴书要求判处他們无期徒刑。

当馬洛里夫人 在克利夫兰被捕时，俄亥俄州有相当多的人提出抗議。由于美籍非洲人社团的压力，馬了·路德·金牧师签署了門罗保卫委員会的請願书，要求密查尔·迪薩尔州长不要引渡梅·馬洛里。馬洛里夫人获准受一次行政审訊。两个月后，迪薩尔州长决定引渡馬洛里夫人回門罗。

迪薩尔州长不顾来自克利夫兰和全国各地的工会、公民权利組織和社会团体的成千封抗議书和电报，仍然作出上述决定，并拒絕改变。迪薩尔州长为他的决定辯解，說这是根据他同北卡罗来納州长特里·桑福德的两次電話会談作出的，后者向迪

薩爾州長“保證馬洛里夫人將在北卡羅來納法院得到公平的審判”。

難道這位號稱為偉大的開明的俄亥俄州長仅仅因為北卡羅來納州長的保證，就真的相信黑人能夠在北卡羅來納法院得到正義嗎？北卡羅來納是這樣一個州，在那裡，有一個黑種男人因被控向一個白種女子眉目傳情，或過於注視，就被判處五年徒刑。儘管當時的事實是他遠離她七十五英尺，他還是被州最高法院判處五年徒刑。

它也是這樣一個州，在那裡，僅在兩年以前，一個十七歲的黑人少女由於抗議監獄的伙食太壞，竟被看守活活地打死。州政府給她的父母一千九百美元就算了事。

很明顯，這就是迪薩爾州長關於“保證”黑人得到正義的概念。自从八月份陷害事件以來所發生的事情，難道使他對於北卡羅來納州的所謂“正義”覺得更有保證嗎？

它是這樣一個州，在那裡，當迪薩爾州長在初秋通過電話向特里·桑福德州長“仔細地了解北卡羅來納州維護正義的記錄”時，一個黑人少女被四個白人強奸了；她能够無誤地辨認那四個白人，却無法從任何北卡羅來納州的司法機關得到正義。她先後去過馬希維爾警察局、尤寧縣長辦公室和聯邦調查局，告訴他們，她被強奸，並且告訴他們強奸者的姓名。但是他們都置之不理。當地聯邦調查局辦事處借口這是地方事務而拒絕受理。最後，當來自黑人社團的壓力增長到快要爆炸時，其中一個強奸犯被控告和受審，但在五分鐘內就被宣判無罪。

在這同一個州，在迪薩爾州長決定引渡梅·馬洛里以後只有幾個星期，一個二十歲的黑人因強奸的罪名而被判處十到二十年的徒刑。儘管那個被強奸的白人女子在法院里一再說明被告並不是強奸她的人，白人陪審團還是把被告判罪。他們這樣

干的原因是，他們知道被告同那个白人女子是很久的朋友——这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

同时，在这同一个北卡罗来納州，在这同一个門罗市，另一个因被誣告三項罪状而被拘禁二十天的黑人青年，当他嘗試从他被拘禁的牢房逃跑时，被一个警察开枪打伤了腿部。这間牢房就是理查德·格里斯沃耳德被殘暴地毆打的那間房。沒有一个北卡罗来納州的律师願意为这个名叫查凡·柯文頓的青年辯护。最后，首都华盛顿的两位青年律师在預定开审前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刻才自願当辯护律师，但是法院拒絕給他們更多的时间准备辯护。查凡·柯文頓被宣判犯了三項刑事罪。他也被宣判犯了兩項違警罪，即抗拒逮捕（因为他要求知道他为什么被捕）和企图逃跑。他因这些罪状被判处七年到十年徒刑。当他上訴时，法院規定在上訴期間的保釋金为一万五千五百美元。因此，查凡·柯文頓仍旧被关在牢房里。最近他受到威胁，如果他坚持上訴，将被另加一个“秘密打人”的罪状。

这同一个法院，同样的法律对于一个被控杀人罪的白人，一个三K党的公开党员，只規定二千美元的保釋金。这个白人被控开枪击中一个黑人男子的后脑而把他打死了。被告并不否认他开枪。他解釋說，他发现那个黑人在偷看当地一家妓院。在这件事情发生前一个星期，另一个黑人被一个白人开枪打中臀部，伤势严重，却因无法交出八千美元的保釋金而坐牢，那个行凶的白人反而逍遙法外。他辯称，他开枪打那个黑人，是因为后者企图闖进屋內或偷看——門罗的法院还没有决定，要怎么說才能够在审訊中听起来最令人相信。

这就是北卡罗来納州，在那里，当我们只是要求州政府的第二号最高級官員維持治安时，他竟因我还活着而表示惊奇。这就是桑福德州长要把梅·馬洛里送回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正

义等待着正在那里候审的黑人青年，等待着約翰·羅里。

馬洛里事件再一次提醒我們，任何一个美籍非洲人只要他住在种族主义者盘踞的地方，就不能够躲开三K党的魔掌。一个北方的州勾結南方从事私刑，这是对美国司法真象的一个暴露。馬洛里事件证明，甚至像俄亥俄这样一个北方的州也帮助种族主义者。特里·桑福德知道他能够指望像迪薩爾这样的同屬民主党的人交还避难的奴隶。

呼吁全世界：“請注視門罗”

在梅·馬洛里被送回北卡罗来納州之后，同我一起被控告的人們，将在某一天在北卡罗来納州門罗的法院受审。唯有警醒的和激憤的世界輿論才可能把他們从政府当局預謀的陷害中拯救出来。唯有世界輿論的視線高度集中在門罗的法院，才可能抑制种族主义当局。

我們呼吁全世界注視門罗，并对一个自称为“自由世界”領袖的政府迫害爭取自由的青年的事件表示憤怒和震惊。

我們已經发动一个世界性的签名运动，以便向联合国人权委員会提交控訴书，要求对門罗市剝夺人权事件立刻进行国际調查。我們呼吁世界各地的勞工組織、人权委員會和学生組織参加这次抗議运动。

关于門罗的被告，我們所抱的唯一希望是，美國还殘留一些文明气息，能考慮全世界对它虐待美籍非洲人的公憤而有所反应。我們希望世界公憤的压力将迫使美國政府使他們得到公平待遇，而不管他們的种族，不管他們作为自由战士的作用和他們对种族主义制度的反对。我們希望他們將回到相信社会正义的人們的正派的社会中来。

这不是一个新的策略。世界的公憤曾在門羅“吻臉事件”中拯救了兩名年青人，使他們免除十四年感化院的判罪。在 1960 年，當門羅市政府官員擬訂一個“城市更新計劃”，申請使用聯邦“清除貧民窟”基金來拆毀有色人種住區的房屋時，我們打電報給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名譽會員潘迪特·尼赫魯，提出控訴。當時艾森豪威爾總統正在印度作尼赫魯的客人。聯邦房屋管理局後來拒絕批准門羅的計劃。1961 年，在入侵古巴失敗之後，當肯尼迪總統借口“為了自由的事業”替美國的侵略辯護時，我們公開打電報（在聯合國宣讀）給總統，要求他提供同樣數量的美國坦克、飛機、大炮、機關槍和雇佣兵，來對抗北卡羅來納州的三 K 党。

目前唯一不同的是，我們將以更大的規模動員輿論。當種族主義者迫使我流亡時，他們違反本意地引導我進入一個更遼闊的鬥爭場地。

這是我們舉行示威的時候了，像那一次我們向聯合國抗議私刑殺害盧蒙巴一樣。我們必須表現那種迫使這個國家在世界人民面前受困的勇氣。與此同時，我們將進一步把我們的鬥爭同我們在非洲的弟兄們爭取解放的鬥爭以及亞洲和拉丁美洲被壓迫者的鬥爭連結起來。他們也將進一步把他們的鬥爭同我們的鬥爭連結起來。立刻消除種族歧視是美國政府做得到的，但是它縱容和煽動對黑人的歧視。

這個政府將越來越發現它所縱容和煽動的反對美籍非洲人的每一歧視行動，將被它所希望施加影響的“不結盟”的有色人民看作是迫害他們的弟兄的罪行。

第七章

自卫：美国的傳統

向压迫者的良心恳求，是不能解脱压迫的絞索的。要对种族压迫这样根本性的問題进行社会变革，就需要用暴力。在这个問題上，沒有暴力和翻天复地的变革是不能有进展的，因为对一些人來說这是保持生存的斗争，对另一些人來說是求解放的斗争。掌权者在維护他們的地位和特权时总是残酷无情的。这不是供美国人思索的抽象法則，这是在美国誕生时就被揭示出来，并繼續为我們的历史所无数次揭示出来的真理。自卫的原則是始于列克辛頓和康克德战役^① 的一种美国傳統。

为种族主义扭偏了的人心

我們終于了解了种族主义的性质。这是一种群众性的精神状态。当我向外国記者，古巴人和其它拉丁美洲人讲述美国的种族状况时，他們对美国种族仇恨之深都大为震惊。我引证了这样一些极端的例子，如在尤宁县实行了電話線路的种族隔离，在华盛顿实行了爱畜葬地的隔离，因而使美国黑人无法埋葬自己的狗等等，他們都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这种关于种族主义心理状态的极端例子，只有当作一种孤立現象看待的时候，才显得荒唐可笑。实际上这些例子，按照构成种族主义心理状态的前提來說，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如果这样来看待这种現象，那么这些例子就是极端病态心理的必然产

①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名战役。——譯者

物。种族主义者是一种一想到同黑人进行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要歇斯底里得发瘋的人。正是这种叫做种族主义的群众性的心理病态，构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美国黑人的解放最終在美国实现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許多新发展之一，将是建立某种能够糾正那些被种族主义所完全扭偏了心的美国人的政体。总归会找到一种办法使这些瘋子变得健康和健全起来。

* * *

“我們必須創造黑人的战斗精神……”

現在是美国黑人行动的时候了。我們的民族意識和战斗精神正在增长。我所說的是人民群众，是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孙維耳，在佐治亚州的阿特兰塔、薩凡那、梅肯，在南卡罗來納州的哥倫比亚、查理斯頓和格臨維耳等地認識和訪問过的黑人群众。他們就是那些我在哈勒姆的街上，在底特律和芝加哥的街上所遇到的受压迫、受剝削的黑人。我說的也就是門罗的人們，那里在五年以前当我开始談自卫的时候，我走在街上，我的許多黑人邻居都会走开躲避我。而今天，尽管有聯邦調查局的通緝和我的逃亡，尽管有陷害性的逮捕和随之而来的枪杀，尽管有把《十字軍战士报》的职员約翰逊太太从門罗赶走这样的威吓运动，尽管有这一切，但是門罗的黑人仍然繼續进行着斗争。

作为《十字軍战士报》的編輯，我在1960年秋天到南方去，深入到种族歧視地区，去考察爭取自由的斗争。那时我就看到在南方各州到处洋溢着一种新的令人鼓舞的精神——这是几年前还在文明的空白点充当奴隶的人民所具有的要求打碎奴隶鎖鏈的决心和英勇精神。我一天天地看到关于美国黑人沒有能力团

結和行动的古老神話破灭了。

在薩凡那，一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捐赠了三万元給地方分会。分会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員和有好几个房間的办公处。糾察員和入座示威的人都挨了打，遭到解雇，但斗争还是进行下去。那里的领导人不怕对他施加的暴力，因为人民同他在一起。在那个城里，有位美国黑人工会領袖說，美国黑人群众終于認識到“我們必須用暴力对付暴力來保卫自己”。許多黑人群众都說，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必需挨一頓好“揍”，打掉他們的威風和白人的优越狂。

我在阿特兰塔听說，伊萊哲·穆罕默德先生給人以很深的印象，而且使得那些可尊敬的黑人領袖感到狼狽不堪的是，許多美国黑人現在也都知道，他可以貢獻的东西远远超过祈求得救的軟弱禱告。南卡罗来納州有一位著名的牧师說，“我們最大的絆脚石是湯姆叔叔式的牧师，人們必須停止付錢給这些叛徒。”在阿特兰塔有位大学教授，他对黑人的新精神感到很兴奋，非常希望新的有战斗性的領導会代替老的湯姆叔叔們。他深信，这些湯姆叔叔的日子是屈指可数了。

我們中也有一些例外。那些湯姆叔叔、犹大^① 和黑人“上层人士”中的奎斯林^②，会否认这种正在增长着的觉悟。他們尽一切可能使美国的白人相信那不是真的，同时又为那些压迫我們的人辯解。这些“負責的”黑人中有些人害怕战斗的行動会損害“良好的种族关系”。他們抱怨說种族关系可能恶化到使許多黑人丢掉飯碗的地步。他們的意思是，会丢掉他們自己的飯碗。因为黑人工人总是最先被解雇，最后被雇用——如果也會被雇用

① 犹大(Judas)，聖經中出卖耶穌的使徒。——譯者

② 奎斯林(Quisling)，1940年在納粹統治下組織的挪威傀儡政府的人物。——譯者

過的話。他們的情況已經壞得不能再壞了。

我們認識到，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必須展開鬥爭，從背叛我們的黑人奎斯林手里把領導權奪過來。這樣，那些把幾十萬美元傾投入到我們在南方的鬥爭中來，想把我們改變成和平主義者的白人自由主義分子，就不得不接受我們對形勢的理解，要不然，他們就只好拋掉他們自由主義的偽裝。

為什麼白人自由主義分子要我們不用暴力呢？我們不是迫害者。我們遭受犧牲已經三百多年了！但是沒有誰花錢到南方去要求種族主義者成為殉道者或和平主義者。他們總是到被踐踏的黑人這裡來，這些黑人已經受盡壓迫，並且作為一個集體也太順從了，而白人自由主義分子却還要他們不要還擊。當白人向黑人灌輸一種特別的學說時，似乎有某種奇怪的利益一致之處。這就像種植園主要利用神學來使奴隸基督徒化一樣。奴隸所受到那樣的一種教育不能產生積極進取的獨立精神和尋求正義的精神（這種精神在美國還是殖民地的時候稱之為新英格蘭的良心），他們被灌輸的是“相信你的主人”、死後升天的基督教式的十足奴化宣傳。

正因為我們的戰鬥精神在增長，他們才花幾十萬的美元來把我們改變成和平主義者。正因為我們的戰鬥精神在增長，他們才出於恐懼到我們這裡來。

那些高貴的黑人領導是非暴力的最直言不諱的代表者。但這些人，尤其是牧師們，既然是這麼純粹的和平主義者，為什麼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指責美國的戰爭準備呢？為什麼他們中間出來反對原子弹的人這麼少呢？這難道不是人們可以從真誠的和平主義者那裡指望聽到並且的確聽到的宣傳嗎？負有責任的黑人領導所關心的是我們不要同白人種族主義者進行鬥爭，不要去“煽動”和觸怒他們，只是在這個範圍內，他們才是和平主義

者。他們經常向我們說，如果我們採取暴力自衛，我們就会被消灭。他們并非阻止一切暴力，他們只是由于害怕被消灭而阻止对白人种族主义者使用防卫性的暴力。

害怕消灭是我們已在門羅揭穿的一个神話。我們揭穿这种神話，是因为我們对种族主义制度終于有了一种积极的了解，同时掌握了暴力和种族主义之間的关系。暴力存在于种族主义制度的深处。美国黑人斗士之所以富有“战斗精神”，是因为他在保卫他自己，保卫他的家屬、他的家庭和他的尊严。他并没有把暴力帶到种族主义的社会制度里去，暴力早已在那里存在，并且一直就在那里存在。恰恰是这种沒有受到挑战的暴力使得种族主义的社会制度延续了下来。当人們說他們反对黑人“使用暴力”时，他們真正的意思是他們反对黑人保卫自己，反对黑人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独家壟斷暴力进行挑战。門羅的經驗表明，只有暴力对双方都有威胁的时候，法律才倾向于保持和平。

当美国黑人为他們的权利而进行抵抗和斗争时，他們拥有的力量不只是他們的意志和双手所产生的力量。处在今天的形势下，最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美国政府，显然不能将两千万黑人都消灭掉。我們知道，今天世界上正在进行着一場偉大的爭夺权力的斗争，而真正能左右力量对比的是有色人种。我們也都知道，根据底特律几次种族暴动的統計，这个国家的生产会在四十八小时内垮台。全世界的人民随时都准备支持我們的斗争。

我們也不要忘記，就是这一些进行欺骗性的和平主义說教的富裕的南方黑人，从斗争中得到了好处，在大多数美国黑人还在受苦时，他們过着奢侈的生活。这些人比附近的南卡罗来納州查理斯頓地方的黑人奎斯林好在哪里呢？这些奎斯林隨身携带着反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反对种族合一的宣傳品，带着一大卷的鈔票和公費報銷单，带着白种公民委員會的祝福，乘一辆

嶄新的粉紅色的《卡迪拉克》牌汽車到处兜風。當白人種族主義者陷于絕望的時候，黑人猶太們的身份就抬高了，這是一種很有諷刺意味的現象，——雖然白人種族主義者陷于絕望對於我們這些從他們的叛變行為中吃到苦頭的人來說，倒是一點小小的安慰。

在門羅我們同三K黨鬥爭，而被宣告有罪。門羅有些孩子成長起來受不到任何教育，有些孩子沒有鞋穿，有些沒有東西吃。老年人缺乏医药照顧。門羅的黑人沒有工作，沒有福利。擔任官職的黑人領導在北方籌來了許多錢，但沒有一人給一分錢給門羅，因為捐錢的白人自由主義者認為我們是歹徒和凶手。他們寧願讓我們受苦而不願表示和我們的立場一致。他們派大隊貨車到南方其他各地，却因為我們採取了英勇的立場就同我們作對。

我們的那些赤着腳長大的孩子們在成長中也就培养了在種族歧視的學校里所得不到的辨明方向的意識。在門羅曾經有過黑人少年發生集團毆斗的危險。但是當他們認識到這個問題因而解決了他們的困難時，這種危險就減少了。黑人青年感染上想干一番事業的願望是很自然的。這種願望如果受到活力較少的成年人的壓抑，就可能被引向錯誤的方向。青年人的精力能夠被引導到建設性的英勇行動中去。應該使青年黑人建設性地向種族的不公正展開鬥爭，而不要在自己人中間開火，這完全是一種常識。危險不因肤色的界線而有所差別；應該為了正義的事業去流血，而不要仅仅為了血的刺激就去流血。現代青年沸騰着一種叛逆的精神。最好把這種叛逆精神用來反對真正的敵人，而不要用來反對那些甚至還不能解釋為什麼發生危險衝突的少年學生。

蒙哥馬利城的公共汽車抵制事件也許是採取徹底的和平主義行動的最成功的例子。但我們必須記住，在蒙哥馬利儘管黑

人能够坐在公共汽車的前面，但那里也有黑人在挨餓。蒙哥馬利城的公共汽車抵制运动是一个胜利，但那是有限的胜利。这沒有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这並不意味着黑人小孩能受較好的教育，这並不意味着經濟方面的进步。

对白人种族主义者來說，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問題呢？他們有什么牺牲呢？要知道在蒙哥馬利城大多数美国白人有汽車因而并不靠公共汽車。这就像我們要求在門罗图书馆中实行的种族合一經驗一样。我訪問过我們县的議会主席，我告訴他我代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要求共同使用图书馆，因为我們自己的图书馆燒掉了。他說，“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你們不能同我們的人使用同一个图书馆。这不会造成什么差別。反正我是不去看书的。”在南部的很多白人对蒙哥馬利城汽車抵制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这样。控制着該城的白人反正不坐公共汽車，他們有私人汽車，因此这对他們沒有絲毫影响。

但是当美国黑人参加到爭取有权过人的生活和得到和白人同工同酬的权利的斗争中去时，他們就会遇到最大限度的抵抗，包括为警察所寬容或鼓励的暴行。在那样的情况下，必須使种族主义者明白，向我們进攻他們自己就得冒生命危險。他們的生命到底是白种人的生命，而他們认为白种人的生命是优等的，他們为什么还要冒險以优等的生命来拚劣等的生命呢？

我現在相信，許多其他的黑人也相信，我們必須創造我們自己的黑人战斗精神。我們必須領導我們自己的斗争，实现我們自己的目标。我們必須承认，許多美国黑人对于控制着“黑人”自由运动的所謂白人自由主义者，已經不相信或极端怀疑了。他們感到沒有一个白人能够理解一个受压迫的黑人的处境。民权团体的傳統的白人自由主义領導，甚至那些白人急进派，一般都不理解我們的斗争是什么，以及我們是怎样看待我們的斗争

的。他們總是把我們的鬥爭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多少年来，我們也沒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他們為了保持良好的公众关系宁愿忍耐。但我們对报上的好評并不感兴趣。我們的兴趣在于得到自由。对我來說，压迫是有害的，是痛苦的。早晨，我作为一个受压迫的黑人醒来。中午，我作为一个受压迫的黑人吃午饭。晚上，我作为一个受压迫的黑人上床睡觉。如果我能够在三十秒钟內获得自由，也不会嫌快。

1827年創刊的第一張美国黑人報紙在第一篇社論中开头就說，“別人替我們說話的時間已經太長了”。這句話从第一次在《自由新聞》上出現以来，已經过了一个半世紀，但这句話的真理的光芒并没有黯淡下去。这句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恰当了。

的确也有一些白人，他們願意帮助我們而不附帶任何条件。他們願意讓我們領導我們自己的鬥爭；他們真誠地关心黑人的解放。如果不是由于我从北方的一些白人那里得到了支持的話，我是不可能在南方呆这么长的。如果沒有白人的帮助，我永远也逃脱不了由聯邦調查局煽起的私刑杀害的追纵，也到不了古巴去避难。为了正义，为了人的尊严，他們將會願意繼續帮助我們。

“美国的每一种自由运动都被 貼上‘共产主义’的标籤”

我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大多数思想正派的美国人現在都会感到，在美国发生的每一种自由运动，每一种爭取人的体面和尊严的运动，每一种寻求公正和社会正义的运动，每一种爭取人权的运动，都被烙上“共产主义的”标记。一旦有一个白人参加了爭取黑人解放的运动，这个运动就自动地被扣上了“在莫斯科支配下”的罪名。我也不能期望有什么例外。

这种共产主义的玩艺儿現在变成了一个陈旧的标本，成为陈旧的标准罪状。任何一个不妥协地反对种族主义者的人，任何一个唾棄宗教狂热者和头号保守分子的人，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

这样以来就給了共产主义者很多声望，因为在南方我所进行的运动中，的确有很多人都对共产主义者沒有認識。我們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到过馬克思。当你談到馬克思的时候，有些人会以为你談的可能是一支鋼筆，或者是紐約市的出租汽車的司机，或者是电影中的喜剧演員。

但是人們热望自由。在人們受到压迫时，他們就要求获得解放，不管領導者来自何处。在卡尔·馬克思誕生以前，美国南方就实行着对黑人的压迫和奴役，而在馬克思主义存在以前，黑人就一直进行着反抗压迫的起义。甚至早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期，在贩运奴隶的船上黑人就进行过起义。美国黑人奴隶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着黑人进行各色各样的秘密策划和起义的历史。

确实，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黑人爭取人权的斗争，但黑人不需要由任何哲学家或政党来告诉他种族压迫是不对的。种族压迫本身就使得黑人起来反抗。門罗的人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抗議的，他們是在这个基础上拒絕附和种族歧视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的生活准则的，他們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反对种族偏見狂的。我們知道，南方的頑固派、南方的种族主义者是精神不健康的人，是有病的人。說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以經濟剥削为基础，这是不在話下的。

我們是被压迫者，不論这种压迫的根源和目的如何，实行压迫的种族主义者的思想和人格已經誤入邪道过久，以致他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即便經濟情況有了改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需要一个巨大的震动，才能治好这种精神病。我看到过治

疗某些精神病的最有效的方法，其一就是震动疗法。而震动治疗必須首先来自美国黑人本身，以及他們同他們的白人同盟者和白人青年們的联合。

我所領導的运动不是政治組織，它同政治团体沒有任何組織联系。这是憎恨压迫的人民的运动。但是关于我們的运动我想指出一点。美国的压迫者和种族主义者，最好把发生在北卡罗来納州門罗的事件，当作一个教訓。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新的态度，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它意味着黑人正在发动起来。它意味着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种族爆炸。門罗只不过是开始。我敢預言門罗将成为新的美国黑人的象征；成为美国黑人不惜任何代价决心使自己摆脱种族偏見的污辱，摆脱种族仇恨和压迫的痛苦的象征。

黑人民族主义——另一个标籤

黑人民族主义的标籤如同共产主义的标籤一样，是毫无意义的。美国黑人憎恨被抛在一旁和遭受压迫，憎恨不許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他們因为受到排斥而形成自己的集团，开始試圖創立自己美滿的社会，于是他們就被称为“黑人民族主义者”。

这是一个使人迷惑的头銜。因为你首先必須記住，我是一个美国黑人，并且被剥夺了进入美国社会主流的权利。作为一个美国黑人，我受到排斥和歧視。在美国，我們是最受排挤、最受歧視的集团，是最受歧視的阶级。因此很自然地，我把绝大部分精力用来解放我的人民，他們是最受压迫的阶级。

至于說到“黑人民族主义者”，这是很难下定义的一个字眼。如果从排斥白人或者歧視白人，或者对白人有偏見一点來說，那我可以說，我不是一个“黑人民族主义者”。我倒宁愿把自己看成

是一個“泛”民族主义者。這就是說，我對全人類的問題都感興趣，我對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問題都感興趣。我相信我們都有同樣的鬥爭，爭取解放的鬥爭。歧視和種族仇視是討厭的，正如我反對美國的種族歧視一樣，我也反對世界上各個角落和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

我們說的“民族主義”是什麼意思呢？目前的白人美國社會，不能把它說成是別的，而只能說它是以種族為基礎的民族主義社會。但是，只要一個美國黑人為他的人民說話，意識到他的人民的歷史根源和文化並為此而感到自豪，他就成了“民族主義者”了。我不在乎這種標簽，也不介意人們怎麼稱呼我。我相信讓一切人享有的正義。由於美國黑人在我們的社會里是最受剝削和最受壓迫的，我願首先盡力來爭取他們的解放。

* * *

非暴力和自衛

非暴力的策略將繼續下去，並且應該繼續下去。在門羅我們也是相信非暴力的策略的。我們使用過這種策略；我們使用過各種策略。但我們也相信，任何爭取自由的鬥爭都應該是靈活的鬥爭。我們不應採取這樣一種態度，認為只有一種方法是解放的道路。這會成為教條主義。這會陷入如同某些宗教狂熱者所實行的那種同樣的教條主義。我們不能發展這樣一種態度。

如果非暴力可行，我們必須把它當作一種手段來使用。但是終有一天，情況將變得非常明顯，那時非暴力本身將會成為一種自杀的行動。我們在同一個美國舞台上看到更多使用暴力的日子無疑正在來臨。那些曾經非難我們使用武器來自衛的黑人

把他們自己武装起来的日子无疑正在来临。有些人自以为痛恨这样一种想法：扛枪保卫过美国的黑人老兵，会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妻子儿女、自己的家和自己的生命。这些人有一天也会大声鼓吹自卫的。当暴力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是以象征的方式而是以全面流血的运动来袭击他們的亲属和家庭时，他們就会成为首先主張自卫的人，并且把他們的这种立場說成是求生存的問題。当事情不再仅仅涉及只是一些統計數字的某些遥远的黑人，不仅是報紙上的一篇文章的时候，当事情不再只是涉及到他們的邻居，而是涉及到他們自己，并且成为拯救自己的事情时，他們的态度就会改变。

作为一种战术，我們使用并贊成非暴力抵抗。但是，我們也相信，如果一个人听任自己受辱，任人拳打脚踢，听任妻子儿女受到攻击，并且认为，自己是那样虔誠和公正，如果他进行反击就会玷辱自己的人格，因而拒絕保卫他們的妻子儿女和他自己，那么，这种人是不会有人的尊严的。

我們知道，普通的美国黑人都不是和平主义者。他們不是并且从来不是和平主义者，他們不是由那种会变成良好的和平主义者的材料造成的。那些对絕大多数黑人不是和平主义者这一点有怀疑的人，不妨打一个黑人試試看。从美国任何一条街上随便挑一个黑人来，他們就会发现黑人相信多少把另一頰轉过去的道理。

所有那些胆敢动手的人都会痛苦地发现美国黑人不是和平主义者，不能永远指望他們不保卫自己。那些殘酷无情地毆打他們的人，不能再期望不受惩罚地进行毆打了。

美国黑人不能忘記，他在这个国家所受的奴役并沒因为和平主义者向奴隶主的基督徒良心所施的道义压力和崇高的呼吁而得到消除。

亨利·戴維·梭羅①是一個被人理想化了的非暴力的使徒，這位作家影響了甘地，而且通過甘地又影響了馬丁·路德·金。但是，梭羅不是個教條主義者，他的眼睛是睜開的，並且看得很清楚。我身邊帶着一本梭羅的《為約翰·布朗②大尉請命》，其中的真理在1962年一如在1859年一樣明白，他寫道：

“……為了拯救奴隸，人有完全的權利用武力干涉奴隸主，這是他的（約翰·布朗的）特殊教義。我很贊同他。那些不斷為奴役所震驚的人，也有權為奴隸主的暴死而震驚，但奴隸主活着將比他死去更使他們感到震驚。那些能够做到最快解放奴隸的人，我不会唐突地認為他的方法是錯誤的。

“當我說我寧願要布朗大尉的博愛，而不要那種既不打死我也不解放我的博愛時，我是在替奴隸說話。……我不願殺人也不願被人殺害，但我能預見到在某種環境下，殺人和被人殺對我都是無法避免的。我們以每天的細小的暴力行動保持著我們這個社會的所謂和平。看看警察的警棍和手銬！看看監獄！……我們只希望平安地生活在這種臨時軍隊的邊緣。我們也就是這樣保護著自己和我們的雞舍，保持著奴役的制度。我知道我們的群眾認為夏普的來福槍和左輪手槍唯一正當的用途是在受到他國侮辱時用來決鬥，或用來趕走印第安人，或用來射击逃亡的奴隸或其他同类的东西。我認為夏普的來福槍和左輪手槍這一次是用於正義的事業。這些工具是掌握在一個能夠使用他們的人手里。

① 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美國著名作家，同情黑人的解放斗争。

② 約翰·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美國著名廢奴運動者，主張用暴力廢除奴隸制度。1859年10月，他率領二十二人襲占弗吉尼亞州的哈特渡口，佔領了設在該地的聯邦軍械庫，後在反動軍隊的圍攻下失敗被俘，被處絞刑。譯者

“那种據說一度曾使教堂純洁的基督的憤怒會再一次使教堂純洁起來^①。問題不在于武裝，而在使用武器的精神。在美國還沒有誰如此热爱他的同胞，对他的同胞这么好。他（約翰·布朗）活着是为了他的同胞。他为他們而生，也为他們而死。由和平的公民而不是由士兵，由牧师而不是由俗人，由教友会教徒而不是由战斗的集团，由教友会的女教徒而不是由男教徒所鼓励的暴力，是一种什么样的暴力呢？

“这件事告訴我还存在着死这样一个事实，还存在着人死亡的可能性。在这以前美國似乎是沒有什么人曾經死亡过。因为一个人要死，必須首先要生存过。”

反对和摧毁那些通向更幸福的生活道路上的障碍，这是美国黑人同所有其他的人所共有的天性。

“未来屬於今天的被压迫者”

每当我在哈瓦那的英語电台广播时（这是向美國的听众广播的），我总希望以某种方式滲入美國白人的精神壁壘，向他們的思想意識中介紹一些新的引起不安的东西。我希望使他們认识到，由于压迫黑人，他們参与了滔天的罪行。无论如何，我要設法清楚地反映这个种族主义社会中所固有的罪恶形象，以使美國白人能够誠实地和充分地看清他們自己的真面目。使他們能像外国人看他們那样清楚地看自己，并且承认他們不是民主的战士。使他們了解，在今天，他們甚至并不真正相信民主。使他們懂得，不管他們怎么想，不管他們喜欢还是不喜欢，世界是在

① 据《圣经》中载：耶穌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教堂时，看見教堂为許多投机商人和其他坏人所占据，作为进行罪恶活动的場所，耶穌憤怒地用手杖将他們赶了出去。——譯者

变化。

因为我知道，如果他們看一看自己的实际情况，他們受到的震动對他們会有很大的疗效。可能有很多正派的美国人会因此理解到，如果这个社会要想繼續存在下去，就必須改邪归正；就会理解到在目前的世界上沒有种族主义国家的地位。

作为个人来看，我并不喜欢“政治”。我所关心的唯一的事是正义和解放。我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但是我认为，只要目前的政策占优势，黑人就不能同美国社会融为一体。在这以前，将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变革。

那些最否认今后的邏輯发展的美国人，就是迫使 I 逃亡的人。这些人是殘酷的。但是，不管如何殘酷，这次流亡还不是这些人替我策划的結局。决定我命运的事并不操在今天的压迫者的手中。他們在历史上的地位使他們不能了解这一点，正如他們的地位使他們不会懂得，非洲每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領袖都被监禁过或逃亡过，今天拉丁美洲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未来領袖們，都正在經历着监禁、流亡或更坏的遭遇。

未来属于今天的被压迫者，我将在美国黑人的解放中亲眼看到这个未来。

附录：

“仇恨总是悲惨的”

馬丁·路德·金

那些坚持非暴力直接行动手段的人承认，法律和法庭命令只能有助于宣布权利，但决不能使其彻底实现。只有当人们自己开始行动起来时，纸上的权利才能有生命力。非暴力抵抗手段之所以有效，在于：它有办法解除敌人的武装，它揭露敌人精神上的防御，沮丧敌人的士气，同时影响敌人的良心。

非暴力抵抗还能提供一种创造性力量，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力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人们放弃他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是正当的和健康的。非暴力防止这种不满蜕化成有害的苦难和仇恨。仇恨总是悲惨的，它对仇恨者和被仇恨者都是有害的，它丑化人的品格，损害人的灵魂。精神病学家告诉我们，很多在潜意识中产生的内部矛盾和不可思議的事情，都是由于仇恨而来的。因此，他们现在说，“要末是爱，要末是死亡。”这就是非暴力的优点，它宣布，你们不用仇恨就能斗争，你们不用暴力就能作战。

作为一个种族，我们必须满怀热情和坚定不移地为争取成为一个一等公民而尽力，但是我们决不采取二等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如果采取这种手段，那末，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是凄凉而痛苦的长夜的受害者，我们留给后代的主要遗产也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无意义的混乱时代。

我們已經到了这样的一天，即对作为人类的我們來說，仅仅一点点自由已經不够了，对由我們組成的民族來說，也是一样。我們已經得到些許自由，但是，和面包不同，一片面包即可減少饥饿，而一点点自由再也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了。自由像生命一样。不能分期賦予你生命，不能只給你呼吸而不給你身体，也不能只給你心臟而不給你血管。自由是一个整体，你要全部占有它，否則，你就沒有自由。

我們的命运是和美国的命运联在一起的，两个世紀來，我們无偿地建設了美国，我們造成了棉花大王，我們建設了我們的家，也建設了我們主人的家，我們忍受了不公正和屈辱，但是，无限的生命力繼續使我們生活和成长下去。如果难以形容的残酷奴隶制不能消灭我們，那末我們所面临的反对者必将失败。我們感到我們是美国的良心……我們是它的受苦的灵魂。

（录自 1962 年 7 月在首都华盛顿向《全國新聞俱樂部》的讲演）

非暴力的社会組織

馬丁·路德·金

說來這有些不像，但事實却正是這樣，那就是爭取民權的鬥爭已經到了一個深刻危機的階段，雖從表面上看來，已明顯地減少了動亂，而且在弗吉尼亞州和阿肯色州的一些頑固反抗的地區，還贏得一些象徵性消除隔離的勝利。

這個危機淵源于一年以前最高法院提出的一個決定，這個決定維護了學生安置法。這個決定雖在當時很少受人注意，但是它却从根本上削弱了最高法院 1954 年有歷史性的裁決，它不知不覺地成了各个強大的對抗勢力間的一個事實上妥協的基礎。

為了有效地貫徹執行 1954 年的決定，這需要聯邦政府採取堅決的並且得到群眾支持的行動來保證一切必要的改革。顯然，立法和行政當局對聯邦政府的採取行動是半心半意的，是不充分支持的。黑人力量的行動雖然在某些場合是英勇敢的，在其他一些突發的情況下也是令人感動的，但是他們缺乏堅韌性和戰鬥性，還不足以填補因政府違約而留下的真空。種族隔離主義分子便迅速抓住這些有利機會，不受道德和社會良心的約束，瘋狂地、無恥地破壞法律。

這個把社會等分的實際效果導致了目前的情況，使哪一方都得不到鮮明的勝利。象徵性的消除隔離正在成為一種定型，這種類型的消除隔離只是對原則的肯定，而沒有實質的改變。

像最高法院的决定一样，它宣告了正义，但它本身不保证千百万黑人儿童将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受到教育。这并不是說它沒有什麼价值了，它有巨大的重要性。虽然如此，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运动的面貌，它揭开了漫长而緩慢的、看不到尽头的变化的前景。我們已經在北方的城市中看到，在許多黑人居住地区，尽管对完全消除隔离的敌对态度实质上比南方要少得多，象征性消除隔离还是变成了一种定型并且一成不变地固定了下来。

这就是危險的所在。完全消除隔离很容易成为一个遙不可测的目标——大部分消除隔离可能被长期擋置下来，为了要求社会的平靜，肯定会播下妥协的种子，这种妥协的真正目标只是在今后长期实行象征性消除隔离。

黑人曾經是 1878 年另一次妥协的悲慘的牺牲品，那时，他們的完全平等权被聯邦政府出卖了。将近一个世紀以来，他們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就处于这样的境地：比奴隶稍好一点，但沒有真正公民权。

有理由相信，1959 年的黑人在現在爭取消除隔离的斗争中，将不会安然接受任何这种妥协。黑人的斗争将继续下去，但是，障碍将会决定斗争的特殊性质。在社会生活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公理，即强加于人的痛苦将导致两种反应：一种是发展健康的社会組織，用坚决有效的措施来抵抗任何妨碍进步的东西；另一种是采取一种混乱的、为憤怒所激动的运动来猛烈地将它打回去，使它遭受損害。它首先为的是要造成损伤，要为了不公正的痛苦而进行报复，其次它才寻求真正的进步，这是惩罚性的办法……既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建設性的。

現在要求暴力的呼声是产生于后面这一傾向。这里，人們必須弄清楚一点，就是对暴力問題現在有三种不同的意見：第一种，是純粹的非暴力道路，这个意見不能迅速地或者容易地吸引

广大群众，因为它需要特殊的修养和勇气。第二种是在自卫中使用暴力，这个意見，一切社会——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最发达、最文明的社会——都承认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自卫的原则，甚至包括使用武器和流血在内，从来没有被人谴责过，甚至连甘地也未谴责过，对那些不能掌握純粹非暴力的人，甘地也許可采取这种手段。第三种是主張把暴力作为前进的工具，主張有远謀地有意識地像在战争中一样組織起来。目前很多黑人都被这种傾向所吸引。这条道路有难以估量的危險，这个危險倒不在于肉体的威胁或牺牲，虽然这是重要的，我們不能設想对人类的生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最大的危險倒在于这样作不能把黑人吸引到一个真正的集体斗争中来，并且使广大的游离的至今尚不支持任何一方的中間集團感到迷惑。除此以外，这还会誤使黑人相信这是唯一的道路，并且使他們处于少数的地位，面对人数比他們多得多的敌人，而不可能以这种斗争方式制胜。当黑人在自卫中使用武力时，他不会丧失支持，他甚至可以靠勇气及其所反映的自尊来赢得支持。当他想使用暴力时，他就会引起使用暴力有无必要的問題，而且必然会因它的后果而遭到指責。不幸的是，事实正是这样，不管黑人怎么做，他們的斗争总不可能不遭到敌人的暴力，他們需要足够的勇气和願意牺牲的精神来击败这种暴力。但是如果追求暴力和組織暴力，他就不能胜利。这就使黑人沒有积极的办法前进了嗎？罗伯特·威廉先生企图使我們相信，沒有別的集体的和实际的办法。他爭辯說，我們要末畏縮和屈从，要末就拿起武器。这个說法大大歪曲了整个問題。有意义的办法是有的。

黑人能够紧密地組織起来，創造很多不用訴諸有害无益的暴力就能够击退敌人的斗争方式。在种族进步运动的历史中，已經发展了很多有創造性的形式——群众抵制，靜坐抗議和罢

工，入座示威，——拒付罰款，保釋被非法逮捕的人，——群众游行——群众集会——祈禱游行，等等。确实，在北卡罗来納州門羅城威廉先生自己的居住地区内，就有一个生动的不用武器或暴力威胁而以共同行动赢得重大胜利的明显例子。当警察非法地幽禁一个黑人医生时，觉醒了的門羅人民就向警察局进军，拥到警察局的會議厅和走廊里，拒絕在他們的同伴获釋以前离开那里。由于不能逮捕所有的人，警察当局便释放了医生，双方都未打算采取暴力。这个經驗就是那位身受其害的医生讲的。

紧密組織起来的群众进军比少数拚死的人手中的枪杆更有威力，我們的敌人宁愿对付一个人数少的武装集体，而不願对付一个人数众多、手无寸铁，但却坚决的人民群众。但是群众行动的手段必須坚持不屈，百折不撓。甘地說过，印度人民必須“决不让他們（指英国人）休息”，他要求他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每天每周地不断提出抗議。这个方法鼓舞了和組織了印度群众，破坏和瓦解了英国人，它在社会和道德方面教育了它的无数参加者。全部历史教导我們，像波濤汹涌的海洋把巨大的悬崖打成碎石一样，人民不断要求他們权利的坚定的运动，总会使旧的秩序崩溃的。

正是这种斗争形式——通过群众行动与邪恶不合作——“决不让他們休息”——向那些为暴力所吸引和煽动的人提出了一条更有效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大胆和勇敢，因为它不是沒有危險的，它正好面对着恶毒的敌人。它需要有献身精神的人民，因为要喚醒、組織和教育千百万人采取有紀律的和持續的行动，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这种斗争形式比少数有組織的暴力行动能产生更多永久性的和对敌人不利的东西。

目前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停止我們內部的斗争，一致向外对敌，利用一切已有的群众行动形式，并且創造新的形式，决心不

让敌人体息。这是打开走向自由之門的社会杠杆。我們強大的武器是声音，是脚，是有獻身精神的人的軀体，是團結起来的人民，是不停地走向正义的目标。比南方种族隔离分子更大的暴君，已經被这种斗争形式打垮和击败。我們还没有使用过这种斗争形式，如果因为我們沒有看到它的巨大力量和威力而擴棄它，那将是一个悲剧。

为了澄清任何这样的流言蜚語，說我什么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态度前后不一，并且在反对核战争时太优柔寡斷，我可以說，我曾反复地在我的公开演說和我的文章中毫不含糊地宣布过，我憎恨这一个在一切邪恶中最邪恶的东西，并且譴責任何一个战争組織者，不管他有什么地位和是哪一国人。我已經同其他一些美国人一道，签署了許多声明，譴責核試驗，并且，不顾这样照直說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我允許在国内发行最广的報紙广告中发表我的名字。

(1959年10月《解放报》)

反 抗 精 神

杜魯門·納爾遜

对一个领袖的真正考验在于他是否有先见之明：他是否具有这样一些品质，这些品质一旦照他那样接受下来，就能使很多人完全脱胎换骨，并且使亿万人改变到愿意接受改造的程度。正在南方发生的法律范围之内的革命——在政府破坏法律时维持法律——推出了两个领袖。说来很幸运也很必然，这两位领袖都是黑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彻底解放他们的人民的事业。

一个是马丁·路德·金，他很有人望，深受新闻界的尊敬，在自由主义者当中和真正的宗教界，都被认为是一位无可訾议的人物。他是一个雄辩家，几乎所有全国性的宣传工具都为他开放，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因为还没有一个黑人能在这方面望其项背。他出入南方监狱的日子，几乎已成为全国黑人表示忧伤或快乐的安息日，有各种形式的画片为之作报道。他为敌人所作的祈禱和爱敌人的表示，他的尊严，他的严肃完整的人格的感人力量，以及他的道德立场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切似乎使我们不能再对他提出别的什么要求，只能希望他精力充沛，把一场他经常比作甘地为解放印度奋斗四十年的斗争坚持到底。

另一个是罗伯特·威廉，他同前一位领袖几乎完全相反。新闻界不是把他完全忽视，就是对他进行恶毒的攻击。作为一个逃犯、一个被“通緝”的人，他的像片——现在一直阴森森地张贴在

全國各个郵局的布告欄里，他被說成是一個“全身武裝的危險人物”、瘋子、精神分裂症患者。據說他犯了綁架罪，為了規避起訴，非法潛逃，因而要求公民們向聯邦調查局告發他的行踪。雖然人們好幾個月之前就知道，威廉是在古巴政治避難，然而當局方面却沒有人認為應該撕下這張懲罰性的公告，這張敗壞別人名譽的印刷品。而且，作為緝拿他的借口的那件所謂“綁架”案是如此無足輕重，以致那些現在仍被拘留並被控以同一罪名的人，在事件發生了一年以後還不會被審訊，而且審訊已經無限期延期了。

如果說美國土地上有什么人看來像是“受損害的靈魂”的話，那就是這個受糟蹋的人，他的一生是不斷鬥爭和逃亡的一生，他現在亡命國外，他的人格在美國的思想中被置于某種可怕的地獄邊緣，好像對於他很久以前就為之獻身的鬥爭說來已失去了一切價值。但是，很多人心里都疑惑不解，懷疑威廉是不是這兩人中的真正先知。

為了消除這種懷疑，我們可以說：對，他們兩人都是先知，都起作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但是，歷史不容許有這種兩個救世主并存的景象。當賭注已經押下去的時候，只能有一個中選的，不是這個，就是那個，而歷史總是奇怪地選擇那好像最沒有可能中選，和不受大家喜愛的人來充當它的主宰。我必須承認，正是威廉的這種“別扭脾氣”吸住了我的眼睛和注意力，博得了我的深刻同情。他已經被排斥在報紙之外；他的處境是困難的；他不能做到愛自己的敵人；他對南方的那些政治統治者幾乎永遠是破口大罵，絲毫不講外交手段，這樣，上至他那一州的州長，下至北卡羅來納州門羅城的警察局長及其屬員，都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前者會舉行盛大的記者招待會攻擊他，後者會打電話告訴他，要在幾分鐘內在法院前面的廣場上把他吊死……

这一切使我在他身上听到了西奈山上憤怒的声音①。

但是，单說威廉像先知一样，他的声音像銀币敲在大理石上那样准确，那是不解决問題的。另一位圣人也應該得到应有的評价。馬丁·路德·金在他的事业中已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于这个事业，他有着无比的忠誠。他有明确的前进立場，这个立場以前已发生过作用，今后可能还要起作用。在領導蒙哥馬利城抵制公共汽車的运动时，他运用了通过群众行动不和邪恶合作的手段，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对黑人困苦处境的注意。而且，他取得了胜利；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城的公共汽車上不再实行种族隔离了。同时，他是在暴力攻击——包括杀害他的企图在内——之下通过和平方式取得胜利的。在整个过程中，尽管发生了使事态极端恶化的挑衅，他始終坚持着自己的非暴力抵抗政策。

但是，最近在佐治亞州阿尔巴尼城应用这些手段时，虽然引起了广泛注意，却沒有达到該地黑人要求种族平等的目的。如果說阿尔巴尼运动是群众性消除隔离的一个基本标志，那末，这次运动所表明的則是停頓或者倒退。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金的手段在这里有問題，最好让它們再受一次檢驗。

馬丁·路德·金发表出来的一条战略路綫，現在已經如此广泛地为人所接受，以致出現了这样一个危險，即：他将成为今天的布克·T·华盛顿②，人們最終将不得不把他当作黑人解放的一个真正障碍来对待。現在，自由主义分子已經在把黑人分为好坏两种，认为那些跟随金的黑人是“好”黑人，跟随罗伯特·威廉的黑人是“坏”黑人。最近，有人問紐約一家主要的自由主义報紙的編輯，問他为什么不全部报道威廉和門羅城的事件。这位編輯显然是迴避問題地說：威廉是个坏蛋。

① 西奈位于紅海北岸，《聖經》中傳說在摩西过紅海时，上帝在西奈山上授予他十诫。——譯者

兩人之間有很多分歧點。首先要提出的一點是，金不像威廉那樣，他絲毫不考慮別人會報復，也不作防範報復的準備。而我們只要看一看佐治亞州阿爾巴尼城的一段新聞報道，就很快會懂得作好這種準備是多么重要：

“在黑人大学生要求自由後一週，有六輛卡車開來，從車上跳下許多帶着槍支、棍棒和鐵管的人，闖進一個學生家里，把這個孩子以及他的母親和妹妹痛打了一頓。母親的腿被打壞了，腦袋開了花，手也被打得到處是傷，以後整整架了三個月的拐杖。她宣誓後作證，在打她的人當中有一個就是警官。可是，關於這件事沒有提出任何控告。”

威廉說，這類事件是不會在黑人已經武裝起來的門羅城發生的，因為那里的黑人是“有力量的人”。

金和威廉之間有一定的爭論，但並不很激烈，因為黑人比我們聰明，他們不會由於理論上的分歧而互相殘殺。他們雙方都作出了讓步，同意對方立場的正確之處。金說，自衛的原則，甚至是使用武器和造成流血的自衛，“都從未被人譴責過，甚至連甘地也未譴責過，對那些不能掌握純粹非暴力的人，甘地也許可他們採取這種手段。”這裡的推論是，那些比較低一等的人是用暴力來保衛自己的，但我們必須考慮到他們的人性缺陷……或者是缺乏神學教育的情況。

正是在這本書里，威廉說他並不反對金和其他人所主張的

② 布克·T·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 生於弗吉尼亞州富蘭克林縣，美國塔斯克斯師範工業學院的創辦者，美國著名的黑人教育家。他強調對黑人實施職業技術教育，培養黑人的忍耐性和埋頭工作的品性，反對黑人的政治教育，反對黑人進行政治鬥爭和革命行動，要黑人順從白人奴隸主，說什麼“宣傳社會平等是最愚蠢不過的事”，在當時起了瓦解黑人士氣的作用，因此，受到白人資產階級的贊揚，成為統治階級的朋友和親信。——譯者

消极抵抗，他所不贊同的只是，和平主义的义务給斗争强加上了一重限制，使它缺乏灵活性。但是，在另一些場合，威廉曾經提出过不少應該进一步加以討論的严重指責。他說，成千上万的美元正源源不斷送到南方，用以把黑人变成非暴力主义者，收买他們的斗争精神，从而使他們长期保持逆来順受的状态，而他认为，黑人所以受到残酷剥削，首先就要归咎于这种状态。他說，南方的湯姆叔叔这类人是最典型的非暴力主义者，从目前正在发生的这种斗争形式中也获得了最多的利益。

金虽然口头上也支持威廉，但是除了非暴力抵抗外，他总是把其他一切方法都說成是“二等手段”。我不认为这对威廉的抵抗派会有很大帮助。不仅如此，使我很恼火的是，我认为这种說法本身就是一种隔离，——譬如說，我由于性格或个人遭遇的关系，不能承认完全消极抵抗的正确性，它就把我划为二等人了。这便使我要同金爭論一番，要同他辯論个明白。

作为一个偉大的革命道德傳統的继承人，我对他的态度感到气愤，我不相信列克辛頓草地之战、康克德桥战役和7月14日国庆都是二等的东西。这样那就可以把照他这种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偉大的反納粹抵抗运动、非洲斗争的各个方面、以及正在安哥拉形成和剛在阿尔及利亚完成的解放事业，都可以算是二等的东西了。

事实上，这同我們美國的傳統以及，——我相信——全体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基本信念，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致我认为这种态度必須作为錯誤和有害的異端邪說而受到批判，而且金先生應該同其他种族的人辯論整个問題，让是非曲直得到应有的結論。談到种族，我也可以說，我相信在这个国家会有很多很多白人接受金先生所鼓吹的非暴力抵抗，因为这是一个种族主义國家。

唯一真正有創造性的美國和平主義者威廉·路易·葛利遜^①，是如此支持上述觀點，以致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否認奴隸使用暴力和暴動作為武器的權利（除非這個人也反對他自己和其他白人、他的政府以及世界上其他各國的政府動用武力），並認為只要任何人手中還有壓迫工具，那末只有純粹的和平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才會否認奴隸有使用同樣武器的權利。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激烈情緒和怨恨，在他評論《黑奴吁天錄》一書時充分流露出來：

“到處都這樣認為南方的所有奴隸應該拋棄一切現世的武器、避免流血、服從主義、等待和平的拯救、不舉行任何暴動——這些在各地都被看做是理所當然，因為受害者是黑人！他們不能以牙還牙，不能圖謀消滅他們的壓迫者。《聖經》要求他們擯除一切憤怒，無抗拒地忍受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凌辱。為他們的利益作鼓吹的人，決不許鼓勵他們仿效希臘人、波蘭人、匈牙利人以及我們的革命先輩的榜樣，因為這種教導會引起一種最違反基督教義和最殘忍的品質。但是，對那些具有另一種肤色的人來說，情況就大大不同了。當別人向他們啐唾沫、毆打、侮辱、和壓迫他們的時候，可別同白人談什麼和平地屈服、以善制惡……千萬別來那一套，對他們來說，是讓暴君流血！難道有一種專為黑人而設的屈服的法律和另一種專為白人而設的反抗和鬥爭的法律嗎？當白人遭到踐踏時，基督不會同意他們拿起武器來保卫自己的權利嗎？而如果是黑人遭到這樣的對待，基督就會要求他們忍耐、長期受苦、馴良和寬恕別人嗎？”

馬丁·路德·金的理論主張據說是半基督教和半甘地式

① 威廉·路易·葛利遜 (William Lloyd Garrison, 1805—1879)，美國廢奴運動領袖，1831年創辦了廢奴周刊《解放報》，1833年創立了美國廢奴社，主張非暴力抵抗主義。——譯者

的，但是，基督教的路線是很难适用于所謂非暴力积极抵抗那种自封的战斗精神的。《聖經》上有一句与此有关的話說得很清楚，“不要抵抗邪恶，誰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送上去。”要把這句話解釋成“一定要抵抗邪恶”的意思，是需要很大技巧的。金在他的《向自由迈进》一书中強調說，非暴力抵抗是真正的抵抗，而且“最終也就是强者的道路”，也就是說，在“物质上”是“消极的”，但在“精神上”却是十分积极的。我必須坦白地說，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和金博士发生了分歧。我不能想像，除非有什么立刻見效的催眠术阻止凶焰万丈的迫害，否則，人們怎么能从“精神上”抵抗一个迫害者呢？

他所提到的甘地的另一些格言，我也觉得很成問題。譬如說，人們并不想以任何方式击败或制服他們的敌人，以便在斗争之后建立起“可爱的社會”，也不会把对邪恶的譴責应用到任何具体人身上。他說，南方的基本緊張关系不是在白人与黑人之間，而是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間。他觉得，通过爱他們的办法，南方白人将会認識到他們那一方是非正义的，从而产生一种道德上的羞耻之感，以至最后会带来得救与和解。

要使南方白人有羞耻之感，或者使他們认识到这个残酷的事实，即他們要恢复的并且正在拼命要把它永久保存下去的黃金时代，只是一个占有奴隶、蓄养奴隶、驅逐奴隶和猎取奴隶的人間地獄，那是难上加难的。南方白人的罪过集中在他們忠于种族主义的这种团结上，这种情緒使他們看不到社会的真实情况和各种不滿。我确实不信，黑人們向他們讲几句爱他們的話，就能使他們睁开眼睛，因为他們几百年来一直在蹂躏着这些黑人，而同时却始終声称他們像爱自己的家人一样地爱黑人。

毫无疑问，金的方法是彻头彻尾地渗透着甘地主义精神的，他并且一直在大声疾呼地宣传，要把这种精神永远銘刻在正在

斗争着的南方黑人的心上。他以赞同的态度引证的甘地的某些话，一味要求牺牲和死亡，听起来和那些态度最强硬的、杀气腾腾的将军们所讲的话一样令人作呕。甘地说，“在我们获得自由以前，也许得血流成河，但这必须是我们的血。”

我觉得这是十分可恶的。为什么甘地或其他任何人竟要把全体人民投进屠宰场服服贴贴地任人宰割，而不许他们进行任何实际反抗呢？为什么要让刽子手杀人杀得腻了，脱去血衫去干别的勾当，并不因为他们杀害无辜而受到惩罚，甚至被过问一下呢？甘地是什么人，他凭什么来决定该流谁的血呢？

金还引证甘地关于必要时乐意进监狱的话，他引证说，人们应该“像新郎进新娘的洞房一样”。这是多么带有讽刺的意味！又是多么的天真！那些进入南方监狱去的年青小伙子实际上比很勉强很害怕的新郎还要痛苦。这些南方监狱里关满了有性欲倒错病的、性虐待狂的以及有难以形容的欲望和暴行的性变态者。

这些下流坯是南方白人的刑罚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那些由于反对种族主义罪恶而入监的人施以拳打、脚踢、鞭笞以及其他性变态的侮辱，这都是得到政府当局批准，作为执法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些罪行不但被批准，而且还收买犯人来干这些事……这些骯髒的买卖。在威廉的家乡门罗城，就有一个病态暴徒霍华德·斯塔克，他是由于打人而入狱的，有很长一段干这种罪恶行为的记录。这个人在他的自白书上承认，“门罗的警察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我殴打一个‘自由乘客’，他们可以撤销对我的控诉。”

于是，他在当局的纵容下，就把一个名叫理查德·格里斯沃德的人打了个半死。这种行为同南方白人的一贯作法是如此

不可分割，以致当人們提出这件事并提出这份书面供状时，美国司法部竟答复說，在他們看來，这并不違反聯邦法律，他們已經把全部事件都归档結案。事实是，对那些因反对种族主义行为而被捕的人施行的真正惩罚——事實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惩罚，就出現在他們被监禁的时期，也就是金引证甘地的話所說的像新郎进入新娘洞房的时期。

这并不是說，不值得为这个事业坐牢，但是，用这个运动所特有的甜言蜜語把这种事說得那么美妙，会妨碍人民看清南方监狱中的真实情况——比希特勒的死亡營好不了多少的人类墮落的地獄。在这个地獄里，“自由乘客”在受到五、六个警察照例的痛打以后，还要經受倒扳手指直至折断，以及撕开褲子用高压电刺棒对睾丸用电刑的折磨。根据《天主教工報》报道，在那里，妇女的赤裸乳房、臀部和下身，受到寬皮带的鞭打。根据政府刊物《五十州公報》报道，在那里，有人在受审判以前就被过度的折磨或牢房私刑所杀害，而报上去时却說是自杀。这就是威廉所說的如果保证只用和平主义手段就缺乏灵活性的意思。当你保证爱每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对手却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歹徒，你怎么能揭露他的真面目呢？

在金的关于消除种族隔离的路綫中，有一个最使人不安的地方，这就是它沒有和南北战争以前有历史意义的廢除奴隶制度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而那次斗争真正消除了隔离和产生了效果。下文的一些引证实质上代表了美国反奴运动的路綫、信条和聖經，而我們可以明显看出，金企图以甘地主义建立的新的聖經，同这些引证相比，并沒有引起同样的反响。不仅如此，我认为馬丁·路德·金的新經文并沒有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扎下根子，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将不得不取消或抹杀掉抵抗精神中最热情洋溢的某些感情。

偉大的廢奴主义者威廉·路易·葛利逊也自稱為不抵抗主義者，也談不抵抗主義。他告訴奴隸們不要暴動，但他所以如此做，是因為深知，如果奴隸們起來暴動，美國政府就會用聯邦的名義派軍隊去鎮壓他們，這是履行各派之間所訂的契約——也就是以容許和支持奴隸制來換取南方在美國革命中的合作——的一部分。

葛利逊感到，必須首先撕破這個不道德的契約，因此，他在《解放報》的報頭上印了這樣的話：“不同奴隸主結成聯盟。美國宪法是同死亡結成的契約，是同地獄作出的協定。”人們原以為，宪法中的這個痛心的缺點可以被第十四修正案永遠消除，但是很明顯，在向保護南方“制度”的南方政客們作出讓步方面，它所代表的調和精神今天仍在我們的民族生活中起着作用。

其實，葛利逊最初也和金一樣，說什麼“道義上的勸說”會感化種族主義的奴隸主的冷酷心腸的，但是，在經過了十年徒勞無益的努力之後，他矯正了這個想法。“不論在宗教史或世俗歷史中，都沒有記載過人類的壓迫者和奴役者——除個別人以外——曾經為道義上的勸說所感化，從而放棄他們的專橫權力，使被壓迫者獲得自由；相反的事實是，從古法老王及其軍隊在紅海淹死的時代起，直到目前為止，几乎所有的例子都說明他們除非遭到突然毀滅，或者在某種方式下被迫交出他們得來不義的權力，否則總是會一直作惡下去的。在所有那些使人類遭到痛苦和折磨的壓迫者和暴君中間，沒有一個能够在凶暴殘忍、道德敗壞和用心卑鄙的程度上比得上有色人種的奴役者——特別是美國共和派的奴隸主。我認為想靠乞求於他們的理性、良知和好心腸的辦法，來使他們作為一個整體轉移到被迫害的人類一邊，那正像靠同樣的方法把豺狼和蠻狗改造成羔羊和鴿子一樣毫無希望。他們已經失去理性，和畜生一樣野蠻，他們的良知已經像

被燒紅的鐵烙過一樣的麻木不仁，他們的心腸比金剛石還硬。”

葛利逊沒有因此而就主張使用暴力，但他從未停止過用火山熔岩般猛烈的一連串咒罵來斥責奴隶主，斥責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整個社會，他把他們稱之為凶手、綁匪、盜賊和淫棍，並且使用了一切他所能說出口的刺激性言辭，希望把他們逐出民主制度之外。在觀念形態上，他只強調一點：已經在這塊自由土地上的種族關係中深深地種下革命矛盾。他當時的時代正像我們今天時代一樣，充滿著革命風暴（他稱之為“火光閃爍的時代”），他向那些熱烈歡呼希臘、法國和匈牙利革命的人們指出，奴隸們“將從你們的演說、你們的示威和你們的慶祝中得到鼓舞和激勵，來反抗他們的窮困。你們不把施於黑人的任何事情視為暴行，但只要觸動一下你們的特權，就會看到你們是多麼咄咄逼人！”當廢奴運動進入高潮、而南方必需越來越多地利用聯邦權力來維護它的制度時，北方有良心的人們就面臨著一個他們是否要用暴力來反對奴隸制度和種族主義的問題。說我有勇氣對任何加諸於我個人的攻擊能夠像基督那樣地不加抵抗，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當你身旁的人遭到野蠻壓迫，而你手邊就有辦法去幫助他時，你又該怎麼辦呢？西奧多·派克^①在1850年對這個左右兩難的問題給了一個有時代意義的回答。

在一次波士頓的牧師會議上，大多數人決定應該把逃亡的奴隸交出去，以信守同南方簽訂的協議，否則就會使全民族陷于毀滅。派克本能地和激烈地反對這點，他說：

“我寧願看見我自己的房子在烈火中化為灰燼，寧願看見我的家人一個一個地被扔進燃梁燒椽的熊熊烈火之中，以至最後

^① 西奧多·派克 (Theodore Parker, 1810—1860) 美國單一上帝教牧師，有自由主义思想，常對政府提出批評，積極參加廢奴運動。約翰·布朗襲擊哈特渡口，他是秘密策劃人之一。——譯者

也把我自己扔将进去，我也不願把那怕是一个逃亡的奴隶送回去。我的教堂里有黑人，有逃亡奴隶，他們是我的傳教士职位的王冠，是我的牧师职务的玉璽。为了拯救他們的灵魂，我有責任照顾他們的肉体。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教民帶到我的屋里，免得他們落入綁匪們的魔掌。我不得不武装我自己，在我写讲道稿的时候，桌上放着手枪，子彈上膛，火門敞开，随时都准备行动。真的，在我右手够得着的地方还放着一把出鞘的劍。这就是我在波士頓，在十九世紀中叶所作的事，我不得不这样来保护我的教堂的男女信徒。你們知道，我是不喜欢爭斗的。我不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我从来不相信那套胡說。但迫使我去杀人，却不是一件小事情。可是，我該怎么办呢？我生在一个革命斗争和流血就在那里开始的小市鎮里。在那次战争中首先牺牲的人們的白骨，被埋在列克辛城的紀念碑下，上面写着‘为自由和人类的权利献身’。这是我讀到的第一个碑文。这些人都是我的至亲骨肉，我祖父开了革命的第一枪，今天在我的血管里循环的血同在那里流的血是一脉相承的。当我的面前摆着这些事实，我的脑海中浮现着这些紀念物和回忆的时候，有一个教民，一个亡命者，受到綁匪的追踪而跑到了我的住宅里，这时候，我除开叫她进来并且保护她之外，試問还能作什么呢？啊！我的弟兄，我是不害怕別人的，我敢冒犯他們，我不在乎他們的憎恨或尊敬，我也不很介意我的名声，但是我不敢違犯上帝的永恒法律。”

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直接向真正的美国精神，真正革命的美国精神讲话的人。这才是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这才是他們所贊美和堅持的东西。这才是美国精神中的永恒和崇高之处，它超越了那些我們为政客所欺而違反本意地支持了暴政和腐敗的不幸事件。如果不断地告訴黑人，这种精神就是屈从、消极抵抗或忍受別人对他的攻击，他是接受不了的，这也是同黑人本身格

格不入的。我知道，黑人要抵抗，任何別的人也都是这样。可是，現在却有人不断去說服黑人，要他們放棄抵抗，并且把南方种族主义者要他們接受的那种概念，强加在他們要求抵抗的意志之上，这种概念就是：黑人不應該为他們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这已經够坏了，但更坏的是，还要求他們在身边的弟兄遭到攻击时也不伸出援助之手。在忍受別人对你自己的攻击时，也許确有一种使你感到鼓舞的爱的力量，但是，在援助你的弟兄、在保护他和为他而进行斗争当中，也同样是有着爱的……但是从甘地主义者的言論来看，好像为別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根本沒有爱似的。

我觉得，这就是把公开进行抵抗的意志全部包括在美国精神之中的价值。每一个偉大的領袖都知道这点。約翰·布朗的法庭演說中那些具有奇妙的感化力的辞句，就是以这种精神为根据的：“如果我是为了有錢有勢的人和所謂大人物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他們的朋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或者是为了那个阶级中任何人的利益而进行这次干涉，并且像我目前这样在这次干涉中遭到了痛苦和牺牲的話，那就是完全对的了。在这个法庭上的每一个人就都会认为这一行动是值得奖励而不是該受惩罚的了。”

沒有誰把压迫者的心情說得比这更透彻的了，也沒有誰把被压迫者的处境說得比这更动人的了。甚至連仍然是一个和平主义一无政府主义者的葛利逊，也不能否认这些話的正确性，“我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是一个相信在一切情况下都不得侵犯人类生命的人，因此，我以上帝的名义否认約翰·布朗和南方一切奴隶有权使用武器。但是，我不会就此止步，否則我就会是一个魔鬼。我还要以上帝的名义否认世上的一切奴隶主和暴君有权使用武器。凡是在实行了这个原則的地方，一切枷鎖自然就

会立即化为乌有，在那个地方也就没有受压迫的人或压迫人的人了。我希望能依靠向每一个奴隶主的理智和良心呼吁来和平实现废奴，我不仅希望，而且还不停地为此而努力奋斗。但是，作为一个主张和平的人……一个极端主张和平的人，我仍旧要说，愿南方和每一个蓄奴国家中的每一次奴隶暴动都获得成功。看不出我这样说是会损害或玷污我的和平主张。当武器均等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存在着搏斗的时候，上帝知道我的心总是向着被压迫者一方而反对压迫者的。与其看到人们脚镣手铐，卑躬屈膝，我宁愿看到他们举起镣铐来击破暴君的头颅。作为一个不抵抗主义者，我宁愿看到邦克山、列克辛顿和康克德的战斗，而不愿看到南方奴隶庄园里的怯懦和卑屈。”

我要再问一次，难道这些话没有在美国人的心灵深处引起共鸣和反响吗？难道这不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民主意志……所赋予我们的义务吗？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五角大楼的那种新加尔文主义——它把自己的全部毁灭性力量都用来对付一个这样的敌人，这个敌人唯一可恶的地方就在于它和我们一样强大或者比我们更强大……，我说的是这些精神的最好表现，即要求一切别的民族都能得到自由的一个自由民族的意愿，这个民族本能地探索着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

金牧师常常提到亨利·戴维·梭罗是他的理论指导者之一，但他谈的是早期的梭罗。写作《不合作主义》这本书时的梭罗是一个消极抵抗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不加抵抗地让自己的身体受到监禁。他相信，他的一些冥想会随着监狱看守“自由自在地”飞到外面的世界，“而它们才是真正危险的”。但是，只有在看守是一个善良的、不想改变亨利对任何事物的看法的山姆·斯塔浦里的时候，并且在第二天早晨玛丽亚大婶披上围巾来到监狱付清数量微薄的罚款后就放他出去的情况下，才能如

此輕松愉快。

几年以后，当逃亡的安东尼·伯恩斯再度被捕、重被关进监狱的铁牢时，某些曾大力設法營救他的廢奴运动者也在波士頓入獄。当时，在弗兰明罕的一次反奴大会上，梭罗怀着不可抑制的憤怒談到这次监禁說，“我还以为这座牢獄已經燒毀，不再在这片草原上了呢。但是，尽管有好几个馬薩諸塞州的公民由于想从她的毒手中營救一个奴隶而被关进了监狱，在堪薩斯會議上却沒有一个讲话的人对此表示过遺憾，甚至沒有一人提及这桩事。”

这里一点沒有談到奴隶安东尼·伯恩斯曾經和平地束手待縛和滿足于能够自由思想。这里也沒有对波士頓公民們的任何譴責，而只有对他们的高度贊揚，这些公民在西奧多·派克的領導下，曾試圖用暴力武装營救一个依法被判罪、依法被监禁和被押解回去的逃亡奴隶。

梭罗对馬薩諸塞的公民不反抗这次事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他听到他們談自己的公开耻辱时这样說：“啊，政府，不論你怎样对待我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和姊妹，我都会完全服从你的命令。如果你伤害他們，把他們赶到海外去让猎狗追逐或者被鞭打至死，那的确将使我感到痛心，但是尽管如此，我仍要和平地繼續走我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所選擇的道路，直至有一天我为他們的死去而穿上喪服时，我也許能劝服你发出善心。这就是馬薩諸塞的态度，这就是馬薩諸塞的語言。”

然后，他表明立場說，“我决不会这样做——我毋需說我会碰到什么对手，会破坏什么制度，但是，我既爱我的生命，我将站在光明的一边，让黑暗的世界从我脚下滾开，并且号召我的母亲和兄弟跟在我身后。”

十分奇怪的是，正是在这里，馬丁·路德·金的話很像梭罗

會設法使之再生的懦弱的馬薩諸塞人所說的話。他說：“美國黑人必須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能用甘地主义式的话向他們的白人兄弟說：我們要用我們忍受痛苦的能力來同你們施加痛苦的能力相對抗，我們要用灵魂的力量來对付你們的物质力量。我們不會仇恨你們，但是，我們不能安然自得地服从你們不公正的法律。你們怎麼对待我們就怎麼对待我們吧，我們始終是愛你們的。即使你們炸毀了我們的家园，威吓我們的孩子，派遣你們头罩白布的暴戾凶手到我們的居住区來，把我們拖到路边打得半死，我們仍然愛你們。但是，我們不久會用我們的忍受能力挫敗你們。在爭取自由的过程中，我們要如此打动你們的良心和理性，以致將在這場斗争中战胜你們。”

我說，不，永遠不能這樣！我們已經用无数的痛苦向种族主义者呼呼了两百年，够了，够了，够了！……

美國黑人是一個富裕国度的公民，他們有起來反抗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反抗一切剝奪他們各種幸福的企图。为什么要竭力劝說他們走那种道路來重新爭取他們已經在1776年获得的权利呢？你們知道，黑人当时就在这里，并且和我們其余的人并肩作战——出于同样的革命道德，为了同样的今天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再次強調的革命权利：在法律面前一切人完全平等，除去由于經過傳統的和民主的正当程序被判决和证实的罪行而丧失掉平等权利外，誰也不能剝奪这些平等权利。

从历史上来看，黑人也一直是具有这些权利的，別人只是用武力和欺騙才剝奪了他們的这些权利，而他們也总是要进行抵抗，虽然沒有效果——并不是跪着抵抗，而是站着进行战斗，直到倒下去成为鮮血和暴力的牺牲品。因此，現在为什么要竭力劝說他們只用“灵魂的力量”和“精神”再忍受一百年的鞭打、轰炸和侵犯呢？难道要再三再四地忍受下去，直到南方白人“愛”

他們為止嗎？那兒是一個瘋狂的社會，除非全國的其他部分起來制止他們，這些人是決不會放下皮鞭的。如果我們說黑人是公民，那麼，他們就有來反抗專制和獨裁的明確義務——如果可能，就用合法的和和平的手段，如果必要，就用暴力。他們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的享有者，即使他們要放棄也放棄不了。黑人並非生來就是拳擊家的吊囊，專門被用來試驗南方白人打人的耐久力的。

在本書的最後部分，羅伯特·威廉也引證了梭羅的話，但這是晚年的梭羅，當時梭羅在他短促的一生的最後几年里，几乎已完全贊同約翰·布朗通過哈卜渡口事件體現出的那種革命道德。……

這也是威廉正在講着和為之戰鬥的……所不同的只是他是針對我們黑人的情況講這番話的，而千百萬人，特別是千百萬黑人發現這些話大都是真實的。他們希望用和平和民主的手段來反對持續不斷的封建主義，因為我們畢竟有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明文規定。這項修正案說得很清楚，“凡出生或歸化於合眾國並受其管轄之人，皆為合眾國及其所居之州之公民。無論何州，均不得制定或施行剝奪合眾國公民之特殊權利或豁免權之法律，和不得于未經正當法律手續前使任何人喪失其生命，自由，或財產，並不得拒絕給予該州管轄區內之任何人以法律上之同等保護。”

就連知識最差的人也會看得很清楚，這項法令每天都在遭到破壞，在南方更是每時每刻都在遭到破壞。每一項種族主義法律，每一条因肤色而作出的排他性法令都違背了這個修正案。同時也很清楚，這個修正案是革命的，含有不斷革命原則的性質。南方知道這點，並且採取它所能運用的各種反革命策略來抵制它。起草這項法律的人使它具有了革命性，但把它付諸實

現，便經常會和南方事實上的政治結構發生正面衝突，兩者之中必須有一方承認失敗。在通過這項法律，特別是在使這項法律充分完備時，它象徵了黑人和白人要使之成為民治制度而共同努力。廢奴運動者提出了它，南方聯盟的失敗使它勢在必行。人們公開承認，它“使國會有權強制任何一州在戰時或平時給予非裔美國人以自由。”

我們國家的悲劇和耻辱的根源就在於，這個使美國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在全國都得到保證的綱領，這個曾兩次為憲法修正案和一次為擊敗了總統否決權的立法機構法律所通過，並在1954年經最高法院一致予以基本確認的綱領，竟在國家一大片地區遭到粗暴的破壞，而未受到像惠特曼所說的“及時給以恰當懲罰而不使之有一絲逃脫機會”。

威廉要在他的居住地區培植的，就是這種認識到自己是公民、是人的意識。如果政府不採取應有的措施保護他們的權利，那麼，他們就必須自己來保護。他只是不願意承認，他作為一個黑人就不應享有白人所享有的任何特權和豁免權……特別是如果這些特權是政府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由政府資金開支的話。因此，他認為，這就賦予他以一種比南方城市擅自通過的種族主義法律更具有合法性的權力。這就使抵抗成為美德，成為一項愛國主義和維護信仰的行動。

他所做的事在以下各章中得到介紹……他所做的事是通過實際行動、以身作則、頌揚和詩一般的贊美、通過把自己的生命置於為反抗精神的日益甦醒而鬥爭的戰線上來，從而喚起自己的兄弟。他所做的雖然比不上基督的登山訓眾，但可以和列克辛頓之戰相比而無愧。

如果說，在黑人居住地區有什麼真正的抵抗運動的話，那就是——過去是，也許現在仍然是——在北卡羅來納州的門羅城。

可惜的是，如果說它也是整個解放運動中的轉折點的話，那末這還不曾為千百萬群眾所充分了解，因而還不能以此改造自己。不言而喻，人們是應該了解它的，美國人民應該有機會改造自己，應該把奴隸和種族主義分子從他們的思想深處驅逐出去。

梭羅談到一些美國人最難接受的預言家約翰·布朗時說，“追溯過去，我們想不出任何偉大的、或者更聰明、更善良的人能和他相比，因為在當時當地，他高出于他們一切人之上。這個國家要絞死的人，看來是這個國家里最偉大、最優秀的人。不用幾年就會發生輿論革命；在這方面，每一天，不，每一小時都在發生着顯著的變化。”

但是，約翰·布朗在當時還能得到充分詳盡的報道，還能在感興趣的報界得到正大光明的研究和審視。而威廉和勇敢的門羅黑人現在却不是受到污蔑和誹謗，就是必須无声无息地和艰苦卓絕地進行他們的抵抗。世界其他地方不知道他們正在做的事，甚至連他們的名字也不知道。不過，約翰·布朗那般人本來也是一個極端主義者的小組織，不聲不響地工作了很多年，然後由約翰·布朗把它推上了一個光輝燦爛的頂峰，使得那繼承和革新我們的革命原則的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概念得以生存下來。因此，威廉和門羅的黑人也可能会最終成為解放的使者，使所有出生或歸化於美國的人都變成真正的公民。